

記憶

REMEMBRANCE



MA 
KE
SI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12月31日第31期 总第209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209期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专辑（一）

目 录

【专 稿】

- | | | |
|-----|-----------------|-------|
| 周伦佐 | 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的奥秘 | 2-9 |
| 小 鹰 | “概念”六日谈 | |
| 第一日 |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 10-18 |
| 第二日 | 关于“社会发展规律” | 18-21 |
| 第三日 |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 21-26 |
| 第四日 | 关于“阶级斗争” | 26-31 |
| 第五日 | 关于“剩余价值” | 31-35 |
| 第六日 | 关于马克思的六道思考题 | 35-41 |

【评 论】

- | | | |
|-----|-----------------|-------|
| 唐少杰 | 历史之人与历史之作 | |
| | ——科拉科夫斯基及其代表作述评 | 42-65 |

【文 摘】

- | | | |
|-----------|----------------|-------|
| （波）科拉科夫斯基 | 毛泽东的农民马克思主义 | 66-86 |
| （波）科拉科夫斯基 |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跋》 | 87-93 |

【本刊声明】

【专稿】

编者按：2017年10月23日是周伦佐先生辞世一周年，为纪念这位杰出的民间思想家、文革学者，特发此文，以示本刊对作者的深切怀念和崇高敬意。¹

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的奥秘

周伦佐



一位诗人朋友说，如果说不清楚“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毛泽东其人”、“文化大革命”这三大问题，中国历史的天空就将疑云密布。中国历时百年的现代性转变，与马克思的名字紧密相连。要看懂20世纪的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这两台大戏，不可忽视马克思在其中扮演的红衣教主角色。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既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命题，又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课题，更是一个深奥的思想难题。应该从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两个方面，认清它登陆成功的时机、条件、功能。

一

现代性转变在全世界的演出，剧情复杂、情节曲折、主题变幻、时间漫长。视线从意大利这个起点牵出，环绕地球缓慢转一圈，可发现变革浪潮先后席卷的国家大概可分为三大片区：第一片区——宗主国身份的西欧-北美，第二片区——附属国身份的东欧-东亚，第三片区——殖民国身份的南美-西亚-中东-非洲。

其中有三个非常明显的差异：

一是三个片区各自经历的转变时间具有加速性。第一片区16-19世纪，历时四百年之

¹ 关于周伦佐先生的事略著述，详见《昨天》第81期（2016年11月30日）【纪念周伦佐专辑】。

久；第二片区 19 世纪下半叶-20 世纪上半叶，历时一个世纪；第三片区 20 世纪下半叶，历时半个世纪。

二是第一片区国家实现现代性转变过程中，便开始以武力为后盾的民族扩张，对另外两个片区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输出甚至军事占领，竭力划分势力范围，致使世界近代史从民主主义主题逐渐演变为民族主义主题。

三是第二片区国家和第三片区国家的现代性转变，一开始就面临尖锐的民族主义问题，民主主义浪潮不得不因此而转移、平息、变异。

20 世纪 60 年代，国际上曾出现一个十分响亮的概念——“第三世界”。为了赢得联合国表决和国际支持的多数票，各个大国纷纷向它表示友好。直到 1990 年代冷战结束后，这个概念的使用频率才逐渐降低。

将它与数序中的前两个概念相联系，其本义便有两种所指：

一是经济范畴：第一世界=最发达国家，第二世界=次发达国家，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

二是政治范畴：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

当时比较通用政治范畴的“三个世界”划分，大体与现代性转变三大片区一致。

顺便插入一个话头：记得 1970 年代初，“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造反运动被强行终止，深居南海的毛泽东有了闲暇。一瞥小小寰球，不知出于无知还是外交需要，他一反“三个世界”概念的本来含义，以绝对权威的口吻自作聪明地提出自己的第三种划分：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第一世界，欧洲、北美洲、大洋州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亚、非、拉国家为第三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他的划分不伦不类——既非立足经济范畴，更非着眼政治范畴，明显是对“三个世界”及其所对应三大片区的歪曲，完全掩盖了后两个片区国家民主主义主题和民族主义主题的双重变奏。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曾经主宰了 20 世纪的世界历史。“社会主义阵营”通常被视为抗拒世界民主潮流的邪恶势力。其实，只要注意到二者身后重叠

着两次世界大战的背景，就会看到：处于后发展系列的第二片区各国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势，似乎也需要这样的划界和对峙。两个阵营的对抗，不单是专制传统对民主潮流的抗拒，同时更是后转变弱国为了争取民族平等权利共同采取的异端对局。1990年代“苏东剧变”后以独立身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十多个国家，都曾经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铁幕下获得掩护。尽管演奏民族主义主题必然压抑民主主义主题，但在某种意义上，对于这些国家双重主题的变奏和民主主义的湮没，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侵略也要承担一半罪责。

我甚至感到：这些年美国为了谋求民族霸权而对中国和俄国的遏制行为，尽管打着“人权”和“民主”的旗号，却导致了相反的结果——使这两个国家的民族主义重新泛滥和专制主义继续加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平等理想，虽然推动了第二片区各国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却导致了所有实行社会主义建制的国家变成全面的专制主义。这恐怕就是平等主义极端化的恶果。

西方各国19世纪按照马克思主义理念建立的政治团体——社会民主党，曾经组成我们熟知的“第二国际”。它们后来全部演变成了类似于西方主流民主思潮中的平等民主主义一翼，一直在民主的大框架下参与轮流执政，它们与自由民主主义一翼的区别，仅仅表现为比较关注中下层民众的利益。

马克思主义与第二片区各国建立民族国家的趋势结合之后，就已严重变异。指引“第三国际”极端平等主义政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理念，其实是列宁主义。极端平等主义变成专制主义最为容易，因为强制实行社会普遍平等必然取消个人普遍自由。当我使用“马克思主义式”这个前置词来定义社会主义制度，只因为它是这种制度的主根。实际上，马克思主义通过列宁和毛泽东的先后演绎，已经变成这些国家抗拒西方主流文化和确立民族共同性的思想旗帜。它的平等主义理念，一方面异化为便于整合国内各种资源的专制主义建制，另一方面演变成利于对抗西方强国和保持弱国地位的民族主义。它的极端平等观念虽然在国内制度和国际政策的变异不尽相同，但核心部位所燃烧的都是民族主义火焰。

第二片区国家现代性转变中民主主义浪潮的突然退却，只因变革之初的民族危局立即

推出了更加猛烈的民族主义狂澜。列宁/毛泽东式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质是民族主义。

16世纪以来的世界舞台，已经先后上演了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两场大戏。随着20世纪末民族主义表演的落幕，21世纪仿佛又重新开始了民主主义的演出。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必然会促使第二片区国家和第三片区国家朝着民主主义方向转变——完成被长期拖延的民主主义主题。中共政权对民主要求的遏制，其实是在国际和国内两方面阻挡历史潮流。这正是众目所见它的命运大限。

二

欧洲16-18世纪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国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都是现代变革的文化先声，共同指向都是确立民主共同性，也就是在博爱、平等、自由的认知基础上，确立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所必需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原则和制度保障。

只不过，“五四运动”除了具有欧洲同类文化运动的普遍性，更显出不同国际背景赋予的特殊性。16世纪以后，西方先行国家打开了现代变革闸门，旧大陆后行国家的民主主义浪潮也破闸而出。不料逼近20世纪，西方列强的民族扩张使潮流发生了改变。漫长的四百多年因此而被划分为两个时代：16-19世纪——民主主义浪潮高涨时代，19-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高涨时代。列宁所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可算是两个时代之间的转变标志。西方民主国家对外扩张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浪潮，不仅席卷了这个时期才开始现代变革的各个国家，甚至成为整个20世纪世界政治河道的主潮。

已经改变的世界背景，使得中国现代变革的政治局势与欧洲国家不尽相同。在它迈出这一步之时，所面临的不只是内部封建势力的抵抗，而且还有外部列强的威胁。所以，“五四运动”一开始就包含着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双重主题。虽然民主主题的启蒙运动一度席卷全国各地的中心城市，但很快就被来势更猛的民族救亡运动所代替。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20世纪以来所有后发展国家的共同经历。结果是救亡压倒启蒙，确立民族共同性取代确立民主共同性。

这当然只是“五四运动”的民主启蒙主题发生方向性改变的外部原因。

中国的现代变革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在抵达“五四”之前，已先后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何历时半个多世纪尚未成功？因为绵延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束缚太大。

现在都知道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民主启蒙——“五四运动”，是以爆发了爱国学生运动的1919年5月4日来命名的。实际上这一天反倒是这个伟大运动衰微的开始。这之前，以民主启蒙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已经发轫多年，并且摧毁了以儒学为轴心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观念。这一天之后，启蒙之火虽然借救亡之风迅速从北京辐射到全国，但很快被声势更猛的民族救亡运动所淹没。可以说正是从这一天起，世人的目光开始从关注个体的权利转向了关注民族的命运，并且最终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和极权体制在中国的统治。

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理论界在讨论“五四运动”先行的民主启蒙主题由于这一方向性改变而遭致挫折的原因时，大多赞成李泽厚的观点，认为是“救亡压倒启蒙”。

其实这只是事情的外因。在其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驱使世人将目光从民主主题转向民族主题的内在动力，不是别的什么，而是人们依然十分牢固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

“五四一代”所接受的西方个体主义文化观念，之所以没能在中国长期扎根生长，就因为它不能适应中国民众未曾转变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土壤。

同样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为何能够在中国站住脚？因为它正好与中国民众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土壤相契合。

中国的文化大转变早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历史时段即已开始，紧接着最大最公开的转变事件，自然是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一代知识分子高举“科学与民主”之旗，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声中向传统儒学发起猛烈的攻击，宣告了这个笼

罩国人思想近两千年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终结。与此同时，西方以个体主义为主调而又色彩斑斓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尼采主义……纷纷登陆中国，马克思主义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枪炮声中进入中国各种文化观念的角逐场。这是中华民族封建性文化观念的全面断裂和现代性文化观念的崭新选择，人们激烈震荡的思想空间自然充斥着各种主义的对立与交锋，人们急于建构新型文化观念的努力必然包含着对各种主义的对比与认同。

由于这些新颖的主义不是从本土纵向产生，而是从西方横向移植而来，它们要想在中国扎根生长，就必须适合这里的“土壤”和“气候”。

这个“土壤”，便是国人在传统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千年投射下积淀而成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文化心理——人们在认同一定文化观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心理/行为定势，是区别于人的第一/自然本能的第二/社会本能，具有很强的惯性。

中华民族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基础与其群体主义文化观念建筑相呼应：习惯于以民族、国家、君主作为个人存在的价值源，以民族、国家、君主的利益作为个人行为的标准仪。

虽然新文化运动断然否定了传统儒学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合理性，但人们身上千年积淀并世代相传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不可能短短几年就完成转换。新文化运动的风暴主要在中心城市呼啸，广阔的农村没有受到多少冲击，在汪洋大海般的亿万农民中间，不仅孔孟之道仍然保持着合理性的权威，而且认同于民族、国家、君主的习惯心理更是丝毫未变。这样特殊的文化心理“土壤”，对移植来的主义之“苗”自然有特殊的要求——必须具有群体主义特性。

中国当时的“气候”也比较特殊：在反封建的同时还须反列强，而且紧要性还置于反封建之前。这就决定了移植来的主义不仅不能是西方列强的主流文化，而且还必须对其具有消毒和灭杀的功能。

经过这两个要求的严刻筛选，马克思主义终于伴随着俄国革命的欢呼声只身胜出，其它参与竞选的众多主义渐渐退场。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中国现实达成了多层面的契合：它作为西方最具社会批判锋芒的非主流文化，对西方主流文化具有天然的免疫性和抗拒力；它的公有制建构和集体至上理念，广泛适应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它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的专制主义政治传统不谋而合；它对剥削阶级及其剥削行为的抨击和对劳苦大众的同情，赢得了中国下层民众的拥护；它以全面平等为核心的社会理想，极大地调动了中国变革参与者的献身激情；它的唯物主义基础，适宜于在中国撑起近代科学的旗帜；它以“代表世界上最先进阶级行使权力”的新观念代替天赋皇权的旧观念，从而在统治权威的认定上获得世俗的合法性。

这个新群体主义的文化观念，自然不是传统儒学的翻版。这使得它在应对民族主义浪潮扑面而来的世界变局时，具有较强的对内整合力与对外抗争力。当然在多层契合中，最重要的还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群体主义文化观念与中华民族旧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的契合。在这一点上，与其说马克思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在中国社会刚走出封建时代的土地上，不如说它扎根于中华民族尚未摆脱封建性质的心理土壤中。这个心理土壤，既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路径依赖”，又构成极权主义政治制度的“心理支撑”。马克思主义入主之后，中华民族的群体主义文化心理不仅未改变，反而在其强劲呼应下继续延展。

是的，马克思主义正是以其公字当头、国家至上和集体第一的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特性，在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文化心理土壤上，骤然扎下根的。

现代文化大转变，本来是要以现代个体主义代替传统群体主义，经过一番大折腾，现在却回到了新的群体主义！这是中国现代变革在政治挫折之外遭遇到的另一个大挫折。1949-1979年，中国人就生活在这个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的统制之下。

四

当然，马克思主义并非没有一点现代性。它既然属于西方前期现代社会的极端非主流批判文化，批判中就一定包含着某种矫正性的现代性质——例如唯物主义倾向、社会平等

观念、生产交换分配占有消费的宏观调控。

只是当它落脚中国后，自身的群体主义“基因”遇上特殊的“土壤”和“气候”，就变异了——变成了中国人在西方列强威胁下建立民族国家的文化武器。建立民族国家虽是当时一个民族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推进现代性的必备条件，但还不是现代性本身。马克思主义变异为毛泽东思想后，除了动用国家权力集中调配全国资源强制推行苏联式的工业化运动，在政治层面和文化层面完全是反现代性的。

中国现代变革所遭遇的文化阻碍，既来自广大民众的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更来自马克思新群体主义文化观念对它的强劲呼应。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民众传统群体主义文化心理的强劲呼应，一方面推进了确立民族共同性主题的完成，另一方面又打断了确立民主共同性主题的进程。

五

记得1989年，有个别知识界人士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立住脚，完全是第三国际“输出革命”的强加或中国激进知识分子“人为实验”的结果。

这当然是浅薄之论。对于这个牵涉到世界历史变局的思想移植现象，好象只有两位中国学者进行过学理思考——李泽厚与何新。可惜的是，前者虽引出民主主义合理与必然的正论，却理解得比较狭窄；后者理解得比较开阔，却引出极权主义必然与合理的歪论。

认清马克思主义登陆中国的原因，并非在强调它的历史合理性。因为从这里我们还看到：当民族主义主题宣告完成和民主主义主题开始复兴，它的使命也就结束了。1949年10月1日以后中国大陆的几次民主性浪潮，都是民主主义主题复兴的声音。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苏东巨变”，更是世界范围民主主义主题复兴的标志。至今仍然统治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观念和专制政治制度，必将被个体主义观念和民主政治制度所代替。■

2008年12月23日

写于古邛都森林居

【专稿】

“概念”六日谈

小 鹰

第一日 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甲：现在有人讲，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承认“私有财产”，也搞“市场经济”，甚至也有了“股市”和“资本家”，“资本家”还可以入党做官，这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所以，我有点糊涂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听有人说，“今天在世界各国，资本主义逻辑中也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社会主义逻辑中也含有资本主义因素”。因此，看起来二者差别不大了，是不是？

乙：不要说是你，就连邓小平 1992 年南巡时也讲过：“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

甲：当时党内保守势力很顽固，竭力反对改革开放，邓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而且要快上。因此，那时他讲“不争论”，讲“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对的，否则永远也迈不开这第一步。

乙：当然，我们不能否认邓小平的历史功绩。不过，就是因为那时“没有说清楚”这“主义”的差别，后来的路就走歪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关系到我们今后的道路是什么？

甲：那你来谈谈吧，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

乙：我也说不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但马克思却讲清楚了什么是“资本主义”。

甲：哦！他是怎么讲的？

乙：马克思 1848 年写《共产党宣言》时，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那么，当时的欧洲是个什么样子呢？应当说，各国社会体制发展得非常不平衡。法国、英国和德国可能如同我国的三个大省那么大吧？一边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有 50 年之久，海峡对岸英国的工业革命还要更早，约有 100 年了，而另一边德国的反封建运动才刚刚开始。共产主义的幽灵没有国界，它“不胫而走”，在各国思想界中游荡传播。但是，马、恩明确地认为，那时的德国完全没有条件去批判资本主义，不能照搬法国的社会主义文献，立刻去搞什么“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直言痛斥处于封建落后的德国中的假社会主义者，说他们“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甲：这跟“什么是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

乙：你瞧，马克思这里指出了被假社会主义者诅咒的“资本主义”的所有要素。即：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三条，缺一不可！而且，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只有这种完整的“资本主义”可以救“封建主义”的中国，而不是那些“假社会主义”和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原来如此！那你说，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在搞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呢？

乙：改革开放一开始，人们都以为是在朝这个方向走，但我看现在却不是，因为除了一直没有那后两条之外，现在恐怕连“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也没有了。一旦权贵们依仗权势介入“市场经济”，所谓的“自由竞争”就变得很不公平，专制和特权很快就导致“市场垄断”并“两极分化”，反过来又导致社会和官场的各种黑暗和腐败。这和“资本主义”精神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因此，说它是“资本主义”，怕倒是玷污了“资本主义”，还不如“原封不动”地说它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准确些。

甲：看来，现在人们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往往只着眼于经济方面。似乎只要“社会主义”承认“资本存在的合法性”，采取“市场经济”的措施，就和“资本主义”一样了，甚至更好。这是个极大的误导。

乙：就是嘛！要知道，成熟的资本主义搞的不只是“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等经济措施，在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里，她还有一整套政治制度和独立的法制体系来支持和监控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文化上她提倡“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推崇“民主、人权、法制”等观念。这些内容互相支持，是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一个完整的概念，她的核心在于“自由”二字，同时又有公众民主监督的约束，她才会有如此强盛的生命力。而在“党有、党治、党享”的国家里，现行的各种“社会主义”的核心，说来说去，还是脱不开“专制”二字。“劳动群体”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事事唯“马首是瞻”，又哪里来的社会“生命力”和“创造力”？这就是僵死的“社会主义”与活泼的“资本主义”之间的本质差异，也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核心价值所在。难怪马克思如此看重“自由”，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甲：对此，清华的秦晖教授却有个说法：“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秦晖：《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在讨论假问题》，2015年，财经内参）

乙：秦教授如此抨击这一“资产阶级”口号，表明他对其来源的无知和对其真谛之扭曲，实在令人吃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在于，她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都挣脱了封建社会的桎梏。“自由”的对立面是“专制”，“平等”的对立面是“特权”，当时在人权的意义上提出“自由与平等”的口号，是针对“封建社会”帝王和贵族的“专制与特权”而言。具体来说，就是要求“人身、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争取在“人权、法律和真理”上的平等。“自由与平等”这一口号已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基础。“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纳入了“美国独立宣言”之第一条，是美国立国的根基，这句话也曾刻在法国的硬币上。我们现在肯定这一口号，就是因为我国还存在许多源於“封建社会”的“专制与特权”。

甲：可是，秦教授却把“自由”与“平等”本身对立起来，说什么“自由”多了，就会不“平等”，“平等”多了就会不“自由”。由此，他又来划分“左派”和“右派”，滔滔不绝，真是让人越听越糊涂。

乙：一点不错！这里的“猫腻”就在于，秦教授把“自由”和“平等”局限在经济意义上，然后又把它与“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扯在一起，来“批判”所谓的“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从而嘲笑这“普世的价值观”“非常动听”却“经不起推敲”。这种说法是典型的“望文生义”和“偷换概念”。“平等”（Equality）与“平均主义”（Equalitarianism）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同样，“自由”（Liberty）与“自由主义”

(Liberalism)也不容混淆!

甲：是啊！毛式“社会主义”恰恰是对民众在经济上大搞“平均主义”，在政治上则继承封建社会的“专制与特权”。而文革中搞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以及“血统论”等，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人民哪里有过真正的“自由”和“平等”？现在我们要认识什么是真“资本主义”？什么是假“资本主义”？就应当抓住“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概念原有的革命性内涵，从而看出其中的本质差别。

乙：看来，不是别人，正是秦教授自己在“制造伪概念”和“讨论假问题”。我们的《六日谈》反复谈“概念”，就是要防止有人先把“概念”的清水搅混，然后从中摸出几条臭鱼烂虾来忽悠人。人们要警惕“混水摸鱼”的人啊！

甲：现在有人羡慕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羡慕英国和加拿大的国民福利制度。看来，在某些方面，西方的“资本主义”，比我们的“社会主义”，要更接近些“共产主义”，那里的“资产阶级”真的比所有自诩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们更接近些马克思。

其实，北欧国家所做过的事情，正是马克思对封建专制国家所说的，就是破除封建专制和特权，在政治和经济上同时搞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创造“法国的生活条件”。当年刘少奇和诸民主党派主张“新民主主义”，也是往这个方向走。毛派只有“三十亩地一头牛”，满脑子还都是封建帝王思想，就拿“社会主义革命”来说事，这和马克思所说的全然相反，糟践了中国几十年。那时人们没有在理论上看出这重大区别，让毛派得了逞，那如果到现在还不知道“毛病”在哪里？还在大骂马克思和刘少奇，就不能不说是太糊涂了。羡慕北欧国家吗？可以，但应反省为何中国失去了这个历史的机会。毛泽东和慈禧一样，推迟了中国的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很多年。

乙：不过，我也应当补充一句，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本身也并非就是完美和终结，

它也还有许多丑恶的东西和内在的矛盾。西方现代史告诉我们，**资本如果没有规范，对资本主义本身也是致命的。**现在中国的那些不良资产，和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一样，都是长期实行金融去规范化(deregulation)的结果。人太贪了，不断加大“杠杆”作用，弄出无数金融衍生物来，疯狂贷款，风险投资，把钱挪来挪去“投机赌博”，并不实际创造物质财富，最后弄得下不来台。但又仗着头太大不能垮，要政府买单救赎。2008年西方那场“金融风暴”差点没要了“资本主义”的命！**而政府如果打压思想言论自由，没有公众监督，没有法制，那专制和特权就还会滋生。**1970年美国尼克松政府的“水门事件”就是一个例子。总之，“当权者”或“资产者”应当警醒，人的堕落是个熵增加的自发过程，只有外力做功，才可逆转。

甲：好！就算是在道路问题上刘少奇是对的，他读懂了马克思，认识到了资本主义阶段的必要性，那为什么中国还是走了个大弯路？

乙：这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刘斗不过毛，除了共产党内的家长制、一言堂等专制独裁，以及社会上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列宁去世得早，“新经济政策”没能展开，而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头几十年的时间内，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大萧条，以经济的高速增长曾一度引人瞩目。这种高度集中的、强化的国家机器也使它得以抗衡并最终击败入侵的德国法西斯，而一跃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相比之下，在希特勒面前，自由民主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反倒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实践似乎也表明苏联这条“捷径”行得通。当然，由于根本违反了“人类的本性”，根本违反了“社会发展规律”，这一“泥足巨人”的坍塌是不可避免的事。众所周知，在“柏林墙”设立之前，已经有两百万人从东德跑到了西德去，人们用脚投了体制的票。不难想像，一个要靠钢筋水泥墙、靠刺刀和手铐来维持的体制，又能支撑多久呢？

但49年建国以来，苏联的这种颇有诱惑力的假象也曾误导了国人，让刘派的主张在毛面前始终低声下气，理亏三分；其时党内宁“左”勿右，业已“蔚然成风”，而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凡群众运动中的“理智派”从来没人听，“狂热派”则永远占上风。因而，当年刘所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即使今人回到1949年，凭心而论，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在苏联的“成功实践”面前讲出什么话来，除非真正了解苏联的真相、真正了解马克思痛斥种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深意。这就是道路选择之困扰，中国遭毛这一“劫”之必然。由此亦可知，刘少奇能读懂马克思，他不但在1951年就看出毛式“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敢有文字批示反对“合作化”，而且在其“建国蓝图”（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1951年）中，公然主张二十年都不要“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并日后一再坚持当“走资派”，实属不易！否则，文革时也不会成为“过街老鼠”，为亿万人喊打，那时国民就是这个水准。而今天当政的和在野的，又有多少人读懂了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不能做些什么”和“要做什么”？有多少人注意到他所说的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凶恶实质？并在这个意义上，来肯定“走资派”的主张？来支持“回归新民主主义”的诉求？来理解“自由、平等、博爱”之重要？来阐明“民主、人权、法制”之必须？

甲：说到这儿，你看毛式“社会主义”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怪物？

乙：我想，可以说，那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与“封建社会主义”的毛式混成物。这两种“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所批判过的，后者的特征是“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即“专制和特权”。

甲：能具体谈谈吗？

乙：毛式“社会主义”不顾我国落后的小农经济的现实，一味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市场

经济”和“自由竞争”。在生产关系中，以政治权力强制推行所谓“国家所有制”、“统购统销”、“公私合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强迫农民建立“‘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等等。这些滥用“国家机器”的专制做法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和造就了新的一批“贵族”或“官僚”特权阶级。

在分配原则上，毛泽东推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反对资本主义的“商品等价交换”，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他不但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当作“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反而以汉末张鲁的“‘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来搞吃饭、医疗不要钱的“原始共产主义”。

甲：我应补充一句，毛式“社会主义”除了在“生产关系”和“分配原则”上的反动之外，又不停地大搞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弄得人心惶惶、万马齐喑，还加上“大跃进”和“人海战术”的“瞎指挥”，结果国民经济生产力被他搞得一塌糊涂。

乙：对！事实就是这样。由“空想的社会主义”与“封建的社会主义”混成的毛式“社会主义”是一种更加凶恶、更加反动的“社会主义”，它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实践使百姓深受其苦，使国家深受其害。

甲：不过，有人这样替毛泽东辩护，说他同情工农，痛恨官僚，希望早日实现“世界大同”。

乙：应当承认，我国的确存在城乡、工农、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三大差别，而且相当严重，但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通过经济高度发展才能最终消除这些差别。“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这也正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里的主张。事实上，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这些差别今天已然缩小很多。例如，美国解决农业问题就不是靠集体化，而是通过产业机械化、工业化。

甲：那毛泽东是妄图用什么办法来解决我国那“三大差别”的呢？

乙：他是采用专制的手段，例如，他要砸烂“城市老爷卫生部”，就强迫医务人员下乡上山去为“缺医少药”的贫下中农服务。他又强迫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以为靠“外部输血”而不是生产自救，就能消灭“贫穷和落后”。这实际上是妄想采取一种平均主义的办法来跑步实现他的共产主义天朝理想。在这一方面，柬共波尔布特做得则更绝，干脆强制柬埔寨的所有城镇居民，即毛所谓的“城市老爷”，直接搬到乡下去过“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彻底“和工农兵打成了一片”——废铜烂铁！这类执政理念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由落后的小农经济及愚昧的封建文化所滋生的反动的“民粹主义”，这种流氓无产者式的执政行为只是反社会和反人类的野蛮暴力专政。

毛泽东曾不无得意地自称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马克思是假，秦始皇是真”！

甲：这点到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毛式“社会主义”的要害和实质！

第二日 关于“社会发展规律”

甲：最近读到你写的《文革研究向何处去？》一文，¹其中你肯定了封建专制的落后国家里，要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你认为刘少奇的那条“走资派”路线符合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又是根据什么来建立的呢？

乙：我想，他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来考察人类历史的发展。从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生产关系随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变化更新的过程。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划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并将它规律化。说得简单和形像一点，就是“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

¹ http://www.azcolabs.com/xy_wg_study_1.html

甲：这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

乙：准确地说，这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中正确的那一部分。若以肯定的方式来表达，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代替“封建主的社会”必然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但是，正如“第一类永动机不可能实现”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另一种表述方式，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着否定形式的表述。

甲：那是什么呢？

乙：十九世纪末，有些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俄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呢？恩格斯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说：“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1894年）换句话说：处于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国家，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去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

迄今为止，这个规律已为人类历史的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所证实。正面的经验，除了欧洲和北美之外，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兴旺富强，也是个极好的例子。而毛泽东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中国搞他的“社会主义”，就如同要发明永动机一样地荒谬，他必然碰得“头破血流”，大败亏输！因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错误，他是根本地违反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换句话说，毛泽东认为手推磨就能产生“无产阶级”的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那是他发明的“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理论”，不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本人讲得很清楚，即使生产力进步到了蒸汽磨的时期，那产生的也只是“工业资本

家的社会”，还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历史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否定表达式。

甲：照你这样讲，那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宗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错的了？

乙：是的，资本主义在中国从来就不曾得到充分和健全的发展，“复辟”二字又从何谈起？毛式“社会主义”碰了钉子，他不但不“迷途知返”，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动“文革”，要“一条道走到黑”！然而，这个运动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既不符合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落后的实际情形和需要，也违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此注定要失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彻底否定“文革”的依据。以后我们集中谈“文革”的反动性质时，会在“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上更深入地展开。

甲：啊，原来是这样！现在许多人，包括杨继绳同学在内，在批判毛泽东的同时，粗粗一望，便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合理的部分也加以否定。这样做，恰恰是掩盖了毛泽东致命反动的地方，没有打到他的要害之处，因而也不知道以后应当怎样做。

乙：当然，较之自然现象来说，社会现象要复杂得多，因为有更多人为的或偶然的因素介入。但是，现在学界有一种倾向，就是过分强调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和“个人因素”，痴迷于“细节决定胜负”，“津津乐道”那“大历史的小原因”，轻视甚至否认历史本身发展的“规律性”；又因为已说不清楚自己究竟是什么“主义”了，就干脆推崇“多说点问题，少谈些主义”，或者鼓吹“问题导向，步步前进”。然而，我恐怕，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只宣扬“中国特色”，不追求“普适价值”，这样走下去，难免会又陷泥潭，无法自拔。

甲：是的，从大尺度上来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是不断地在进步。现代资本主义社

会中，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素养和创造、文明和生活，整体来说，比以往的奴隶时代和封建时期要前进很多。看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确存在着某种正相关的因子，或“规律性”的东西。当然，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思想方法”问题。

乙：恩格斯曾这样评价马克思发现的这个规律：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1883年）

甲：我对此的理解是：人类要求生存、向往自由，而且也有能力让生活变得更好，无论历史如何曲折多变，就总体而言，这个基本的要求和能力，是不可被阻挡的。因此，是否可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动力，或倒退的根源？

乙：我同意！我也实在看不出，人类社会中有什么其它比这更为基本的矛盾了。被马克思极为看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是一个纲，从这个角度看问题，便“纲举目张”，它对我们正确理解毛式“社会主义”究竟反动在哪里？中国为什么要破除专制和特权，要“回归新民主主义”？等问题，很有指导意义。

第三日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甲：你这里多次谈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法则”，这个法则似乎是个政治经济学中比较枯燥的问题。我只记得，生产力中，除了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之

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是人的素质和生产积极性；生产关系则包括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劳动成果的分配制度，以及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组织形式等等。而合理的生产关系应当由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决定，它应当能够推动而不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大致是这样吧？

乙：是的，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抽象，它是我们每人每天都会遇到的实际问题。比方说，你是否喜欢你与上司及同事间的工作关系？是否满意雇主给你的工作酬劳和待遇？你的劳动有没有合同保障？合同是不是合理？你的工资有没有被拖欠？你是否因种族、性别、宗教、残障或年龄等因素受到歧视？你们单位的士气如何？员工是主动创新还是消极怠工？假如一个企业劳资关系紧张，怨气十足，纠纷不断，甚至出现员工连连自杀的现象，那生产关系肯定是出了毛病，即使在高压之下该企业的产值一时还可以是很高。

甲：如果对个人、对企业是如此，我想，对整个国家来说，就更是这样了。假如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处理得不好，就会极大地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甚至会导致社会动荡，阶级斗争。

乙：一点不错！我们以前也谈到过毛、刘两条路线之争，那焦点就在于生产关系是搞“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的问题。

甲：按毛泽东的看法，他搞“公有制”就意味着向“共产主义”前进，刘少奇主张保留“私有制”就是“走资派”！

乙：这种不顾我国生产力的实际落后水平，人为强制地设置“公有制”的生产关系，真的“就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跳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来实现所谓的“共产主义”的理想吗？

甲：可那时流行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有什么错吗？

乙：其实，对历史上类似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有过研究和结论。王若水先生（《新发现的毛泽东》，2003年）曾这样概述道：

十九世纪末，有些学者还在探索俄国能否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俄国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这种公有制是否可以使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呢？

老年马克思曾应俄国学者的要求，研究了这个问题。一八九四年一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又相当详尽地论述了这个问题。

恩格斯的回答实际上是否定的。“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的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较低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

联系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建立的“人民公社”，问题是一样的。

甲：这也就是说，毛泽东企图通过“人民公社”来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观臆想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乙：是的，而且事实也证明这条路根本行不通。50年代末，毛泽东“三面红旗”的瞎指挥已明显失败，却仍然坚持“反右倾、鼓干劲”的极左路线，致使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并爆发了饿死几千万人的全国性大饥荒。多亏刘少奇于1962年推出了“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的农村经济政策，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毛的“人民公社”，改变了这不合理的生产关系，这才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又通过实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

人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国民经济好不容易才从毛的灾难中恢复过来。实践证明，刘少奇的“资本主义”路线是符合中国的实际状况的。

甲：那么一般来说，怎样判断生产关系是否适合生产力的水平呢？

乙：那就要看它能否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看人是否有生产积极性？是否有创造性？这会直接反映到市场是否繁荣？

毛泽东违反农民意愿，在生产关系上强制搞“集体化”，生产和分配中又搞“强迫命令”、“平均主义”，结果往往导致“吃大锅饭”，“出工不出力”，或造就懒汉和贪腐官员等问题，结果是大家一起混着过“穷社会主义”的日子。你看，自50年代初搞“统购统销”以来，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的那些年，市场越来越不行，没东西吃和用，什么都要按“票、证”供应。

甲：对比解放初期，农民刚分得土地，欢天喜地，发家致富，干劲十足，那时市场供应也还繁荣，要什么有什么；而文化大革命打倒了“走资派”刘少奇，国民经济却变得“奄奄一息”。在70年代末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几户农民自发立约又搞起“包产到户”，被邓变成政策，迅速搞活了农业经济，一时农贸市场供应丰富的程度，决非于六、七十年代可以想象。

请“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解释：人还是中国人，地还是这块地，为什么“生产关系”一变，市场上什么东西都消失了，或什么东西又都冒了出来？

乙：你说的都是些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我们对比50年代初、60年代初、及70年代末那前后几年市场农副产品供应的好坏，就可以看清楚生产关系的改变对生产力的作用了。就这些小段间隔而言，生产力中的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自然环境等物质因素变化不大，甚至人群也几乎是同一个，可以说，生产关系是这期间唯一的变量，

即：主要是僵硬的毛式“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压制了人的生产积极性，而活泼的“自由经济”却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这就是造成上述差别的原因所在。

甲：农业集体化是如此，那么，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又怎么样呢？它是否是适宜那时中国的情形？

乙：对此，我只想举一个例子来供思考。

1957年春，上海永大纱厂女工罢工。这个社会事件引起了刘少奇的关注，他特别指示：《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应予报导。四月末著名记者刘宾雁等奉命到那里去作了半个多月的调查。永大纱厂是个只有二百来人的小厂，但刘宾雁从工人当中却了解到了新的生产关系中的种种矛盾。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从一九五五年全厂工人热烈拥护公私合营，欢迎共产党干部入厂当公方代表，到全厂大多数工人举行罢工，把党的干部软禁起来作为人质，只经历了两年时间。

这是一次很有趣的试验：把私有制度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公私合营实即公有)以后，生产下降，由盈利转为亏损了。工人们对于自己公有制的工厂所享有的管理权利，反倒不如它为资本家所有的时期了。……工人比党干部更担心工厂的倒闭。干部可以调转工作，工人却要失去饭碗。……

甲：后来这场罢工怎么样了？

乙：不久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全国就展开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刘少奇要的这个罢工报导自然不可能再见报了。然而，正如刘宾雁所写的那样：

几个月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另一个时期，从此罢工事实上变成非法的了。永大纱厂这种危机将在几百上千个工厂发生，但再也不会扰乱各层领导的安宁，因为一般不再采

取罢工形式，而表现为不声不响的持久怠工了。讲究实际利害的资产阶级懂得这种怠工比罢工可怕得多，注重装潢和喜爱安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宁愿让工人怠工，因为它不致扰乱社会表面上的安定，又不会给党和社会主义以及崇高美丽的原则丢丑。但这将是无声的腐烂……

甲：看来我国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究竟哪条路线在破坏生产力？究竟哪条路线会促进生产力？谁是谁非，读者应当不难自行判断了。

第四日 关于“阶级斗争”

甲：你这样说，也有些道理。但马克思主张通过阶级斗争来改变生产关系，主张暴力剥夺私有财产，我还是不能赞同他的学说。

乙：的确，人类的私有观念起源于生存意识，这是无可厚非的。然而，财富增加了，社会进化了，人的私欲、贪欲并未减少，整个人类仍处于一种低级的生物性状态，对待同类有时甚至还不如禽兽。这能否改变？怎样改变？我不清楚。在这种阶段的人类，用革命来剥夺、消灭对手阶级，进行财富再分配，实际上只是造就了新的有产阶级。因此，就现在的人类而言，马克思主张阶级斗争，主张暴力剥夺私有财产，并达不到他所说的“共产主义”目的。他给“资本主义”社会开的这个“药方”，的确有问题。在这一点上，我是同意你的看法。可是，我也不能说，这样做就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甲：这又怎么讲？难道阶级斗争会有什么积极的意义吗？

乙：我想，要了解马克思，就要回到他的那个时代。马、恩写《共产党宣言》是1848年。那时的资本主义是什么样子？我没有读过《资本论》，更没有具体见识过。但“资

本的原始累积阶段”恐怕的确是很残酷的，如他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时经济学家的调查是：“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类似的事，我们也许也可以从夏衍先生1936年写的报告《包身工》里略窥一二。如果是这样，马、恩当时对被残酷压榨的工人的同情和对资产者的憎恶，也是可以理解的。想象一下，假如我们有时空穿越的能力，可实地观察当时劳工的悲惨生活、恶劣的劳动条件和贫富悬殊的社会情景，我们今天又会如何作想？还可以想象一下，假如马、恩再世，他们对今天权贵们的“第一桶金”又会作何评论？它是否也是充满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甲：现在已没有人再提阶级斗争了，不是吗？

乙：对这个说法，我宁肯保持谨慎的态度。……这要看你怎样理解阶级和阶级斗争？

甲：什么是阶级呢？

乙：我认为，阶级是生产关系中按地位和利益的不同所划分的群体。杨继绳同学认为“如果消灭了私有制，私人不掌握生产资料，就不应该有阶级了。”但这样讲有点简单化。应当说，只要有生产关系存在，就有阶级这个东西。在封建专制社会的基础上直接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可以人为地立刻剥夺“私有制”，但在这貌似“公有制”的新生产关系中，专制和特权又造成新的“权贵阶级”，他们不仅统治也剥削人民大众或“平民阶级”。这也是《新阶级》一书的观点。

甲：那什么又是阶级斗争呢？

乙：社会财富和权利分配的极度不公造成仇恨，仇恨又导致暴力，你来我往，永无休止，这从人类早期社会起就是如此，并非自共产党始。“活不下去了！”——更学术的说法是：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会有抗争，就会有财产和

权力的再分配，甚至会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管它叫做**阶级斗争**。

当然，任何生产关系中地位和利益的矛盾或不平衡都是绝对的，而适度的不平衡或许还是一种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只有在极度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中，这种阶级对立才会爆发为严重的冲突或“斗争”。

甲：在网上看到，易中天讲，**阶级斗争就是仇富杀富，和土匪强盗没什么两样。**

乙：这种看法太浅薄了，难怪今日的权贵富豪都为之叫好，一致反对再提阶级斗争。是的，历史上民粹主义者和流氓无产者劫持了这一概念，他们的是以此为招牌来这样行的，它为人人憎恶。但恐怕那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甲：那你认为马克思的本意是什么？

乙：我的理解是：**阶级斗争是社会的一种群体的政治行为，目的是改变极度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或社会结构，以解放生产力。**马克思试图以此来解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寻求社会进化的原因和动力。这也许是无数血淋淋的历史事实的归纳，它包括历代封建王朝的更替，包括资产阶级推翻封建贵族的王朝统治社会，也包括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现在中国的各种“群发事件”。尽管在有些变更之后，可能只是一些新的统治集团代替了旧的统治集团，彼此并没有质的差异，但由于新政往往推行开明或让步政策，社会生产力多少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甲：那么，这里阶级斗争的关键词是不是“解放生产力”和“使人类得自由”？

乙：你抓住了要点！**生产力(Production forces)**中，除了资源、工具、设备、科学技术等物质条件之外，最主要的因素是人，是人的素质和生产积极性。**解放生产力的本质就是从各种奴役的束缚中解放人类自身，激发人的独立自主和自由创造的潜能。**这和

通常说的生产能力(production capacity)有联系，但不是一回事，衡量后者的尺度才是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正是资产阶级对封建帝王和贵族的“阶级斗争”，摧毁了严重约束生产力发展的封建的所有制关系，“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1848年）。为什么能够这样？就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把“人”从封建的“专制和特权”里解放了出来，使他们有了“自由和平等”。

甲：那你怎么看待“暴力革命”？

乙：无论你喜欢不喜欢，现在即使抛开“阶级”这个字眼，至少“不公——仇恨——暴力”这一公式在地球上还成立。因此，笼统地指责过去的暴力，指望以后不再有暴力，恐怕是个幻想。而这种迫不得已的暴力革命对社会的进步也或许有些好处，破坏和战争终归会教训人类自己。关键是要顺乎历史规律，走正确的道路。你瞧，美国正是通过战争赢得了独立，又通过战争废止了奴隶制，剥夺了奴隶主的私有财产，使黑奴解得自由，并按资本主义立国，建立了崭新的生产关系，从此“大气磅礴”、“一日千里”。要是没有这两次“暴力”，我想，恐怕也没有今日的美国。

甲：可是，资中筠先生讲“美国是‘谈’出来的国家，不是打出来的。”

乙：资先生的说法，对民主建国、实施宪政有相当的启示，但有些片面，没有抓住实质。

美国“独立战争”的正式名称是“美国革命战争”(American Revolutionary War)，它从1775年打到1783年才“尘埃落定”，英国最终被迫承认了美国的独立。这场

八年战争至少死了两万五千人，美国人争的是什么？就是要改变英国在北美的殖民生产关系。英国殖民者任意加税、强取豪夺，严重地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当地移民极度不满，才爆发了这场要求独立的“革命”。

而后来的“南北战争”（1861—1865）更死了62万多人，仅葛底斯堡一役就伤亡五万多，战况极为惨烈。这又是为什么而“打”？自由的北方联邦持守“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建国原则，主张在“生产关系”中要废除奴隶制，而南方联盟要保留奴隶制；双方“谈”不拢，那只有“打”了。

甲：所以，如果只讲“谈出来”，不提“打出来”，那就会误导人们以为“暴力革命”都是不好的事。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乙：其实，“谈”也好，“打”也好，这里的核心问题还是在于，是民主协商，还是一党专政、甚至是一人专制？而不是单看手段是“暴力”或“和平”的问题。

当然，暴力并非是改善生产关系的唯一选择。现代更多的情形是通过对话、谈判、立法，甚至通过示威、游行、罢工等非暴力的民主方式来实现。这也是“阶级斗争”的形式，只是比较温和罢了。但我们必须明白，旨在摧毁极度不合理的生产关系的暴力革命并不等同于反人类、反进步的恐怖行为，“迫不得已”的暴力革命应当是一种正义的政治行为，不过，它只是人类争取社会进步的最后的手段。

甲：我宁愿走民主这条路。

乙：我也一样。民主是个很好的手段，但需要有制度的保障，要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同时，民众也要有一定的素质，有理智和耐心，这手段才能被得当地掌握和运用。这等以后有机会再谈。

甲：好，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中国的历史。旧中国老蒋搞专制独裁，搞“官僚‘资本主义’”，

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共产党顺乎民意，推翻了蒋家王朝。如果共产党按照历史规律办事，在这个民族独立的新民主主义平台上，放手让刘少奇搞些“资本主义”，本来或许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乙：可是毛泽东陷在“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泥潭里，“发动民众”打倒了“走资派”，文革中更是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他和“四人帮”逆历史规律而行，结果把中国搞得“乌烟瘴气”、“千疮百孔”，反令民众饱尝其恶果。

甲：看来，老毛搞专制和独裁比老蒋还厉害，现代的“权贵资本主义”比当年“官僚资本主义”更贪婪，结果社会没有进步半分，封建主义反而得到大大地发扬和复辟。

乙：可以说，这是历史的倒退。

甲：不过，正是毛泽东鼓吹“阶级斗争”最多，他不是要人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吗？

乙：毛泽东人为地划分等级，制造仇恨，在政治经济上和文化思想上推行所谓的毛式“阶级斗争”，任意破坏合理的生产关系；他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但剥夺了公民正当的私有财产，还剥夺了人民思想的权力与言论的自由，结果，大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它已经完全走了样，成为其帝王专制维权的工具。这已不是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即，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的斗争，因而是我们绝对要摒弃的概念。

第五日 关于“剩余价值”

甲：那你怎样评论马克思？

乙：我对马克思也只略知一二，远无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无力，且也不打算对他做全面的评论。不过，在我的印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实更像是“学者”，而非“政客”。马克思这位“医生”在高度肯定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专制和特权”的同时，也指出了恶性“资本主义”的弊病，指出其内在的“死亡因子”——极度贪婪。这实际上还是挽救了“资本主义”，后者懂得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要保持“规范化”，要分享资本利润和回馈社会，才能“长寿”。

甲：说到“资本积累”以及“分享利润”与“回馈社会”，使我想起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这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乙：马克思的一大发现，就是指出了商品生产中“剩余价值”的秘密，即利润不全部是资本的产物。我想，这“剩余价值”的存在的确是个事实，不过，应当说，其来源并不只是工人的劳动，它也包括资本运作和经营管理，以及必要的自然资源。要是没有后二者，这“剩余价值”也不可能被创造出来。

甲：的确，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和资本，工人便无从劳动起；而没有工人的劳动，前二者也只是一堆死物放在那里，并不会产生任何财富。看来，这“剩余价值”的方程式中，应当包含有这三个因子，缺一则无解。

乙：因此，我看问题不是承认或否定“剩余价值”的存在，而是在于如何合理地分配这个“剩余价值”？不错，和劳动者付出了劳动一样，资本的运作、生产管理、市场经营，以及属于人类共有的自然资源本身，对“剩余价值”的产生，也都是有贡献的，因而它们也应得到相应的回馈份额。然而，如果“剩余价值”全归资本家所占有，那就构成了“剥削”，这对劳动者来说，自然是不公平的。在马克思的时代，这种“不公平”恐怕也是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事实上，当时经济学家的调查是：“可以看到有些工人每天连续紧张劳动十六小时，才勉强买到不致饿死的权利。”而据美国汽车大王亨

利·福特所说，直到20世纪初，美国企业界仍流行着“尽可能少地给工人工资的习俗”。(The custom of paying a man the smallest amount he would take.)

甲：但有些富豪坚持认为，我的钱全是凭我的本事和智慧挣来的，为什么要去补贴别人？

乙：对此，曾是世界首富的投资家华伦·巴菲特却有个有趣的看法：“他们会那么富有，都是因为有这么个社会，所以要对社会有最基本的回馈。如果他们认为自己一切都是靠自己赚来的，那么就让他们重新投胎，诞生在西非的马里共和国，家里五个小孩，只有挨饿受怕的母亲抚养他们，长大后被送到象牙海岸的可可园当奴工，看他们能变得多有钱、多成功。”(艾莉丝·施洛德《雪球：巴菲特传》，2011年)

甲：巴菲特的揶揄激怒了不少富豪，他们咒骂他是个“恶毒的民粹主义者”、是“一隻有钱的老鳄鱼”。

乙：这事自然可以争议。不过，从总的趋势来看，相对于马克思的时代，现代资本主义在这方面已有许多改进。除了“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之外，通过“分享利润”与“回馈社会”、“回馈自然”，它对劳动者、对社会整体，以及对自然界本身都有更多的顾及。当然，还可以做得更好，更公平合理，是不是？

甲：的确，现代的资本主义已与早期大不一样。美国以及一些先进工业国，特别是从二战之后，在政府的干预之下，设立了反企业垄断法、非歧视的雇佣法，设置最低工资、最高工时的标准，建立了雇员休假、劳保、医疗、退休等福利措施，以及社会贫困和失业救济制度；同时，也开始注重改善环境污染的社会问题。而通过资本利润的分享与回馈，工薪阶级的工资和福利不断改善，生活水准大幅度提高，也可以参与股份投资。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中，稳定的中产阶级享有民主和自由的权力，生活具有相当的保障，有受教育的权利和能力，也有进取的余地和盼望；同时，他们又成为国家

税务的主要承担者。尽管现在劳资之间仍会有矛盾，不时仍有罢工发生，但国家在整体上却仍然是稳定的。

乙：也许，这种改良的“生产关系”正是“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教训了“资产者”的结果。不改革，不让步，就可能被推翻。假如历史上被压迫的“无产者”从来没有做过任何抗争，恐怕“资本主义”也不会进步到今天的地步吧？

甲：是的，但除了社会革命之外，现在有了更好的方法。北欧的实践表明，在发达的市场社会中，通过高额的所得税，进步的契约意识，完善的法律，使公民都有权在医保、教育、住房等方面公平地享有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这一切是通过非革命、非阶级斗争完成的。

乙：不错，在如何处理“剩余价值”的问题上，这也是一条路。人会变得聪明起来的。记得有人曾问比尔·盖兹，你做慈善事业，是否是出于对穷人的怜悯？比尔答道：“不是的，我是为了自己，我是美国制度的受益者，我不希望这个制度出现巨大的动荡和不安，在政府力所不能及的地方，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力量，弥补这个社会的空缺，尽量地消除富有与贫困之间的差距，让这个制度能够更加稳定，这实际上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企业更好地发展。”

甲：我也举个例子。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在1914年1月主动把公司的最低日工资从2美元提高到5美元，工时从每周54小时减少到48小时，深受职工欢迎，并一时轰动了社会。但许多雇主认为这不过是在做广告而已，他们又谴责福特“搅乱了尽可能少付工资的惯例和标准”。福特回答道，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我们认同的社会公义性”，也不只是“为了让别人快乐而使我们自己的心灵得到满足”，同时这也是为了“使企业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福特认为，“低工资意味着低购买力，结果抑制了国内市场”，而“大多数人的工资等级与生活品质决定着国家的繁荣。”(Henry

Ford, 《My Life and Work》, 1922)

乙：这些在“生产关系”中主张双赢的见解，与前面谈到华伦·巴菲特关于回馈社会的理念类同，就是说，个人的成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环境与开明的政治制度，要懂得珍惜和保护它。但世间不是所有人都像比尔、亨利和华伦那么聪明，他们因为喜欢自由和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希望她能保持长久。而另有些人则往往要以艰难痛苦的办法才能学会些东西。所以，不可轻言弃绝第一条路，尤其是在那些专制制度的国家里。

甲：听说国内现在根本不许提《资本论》，有民工学《资本论》，讲《资本论》，差点就进了大牢。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似乎也触痛了某些官员的神经。

乙：权贵们岂止是要掩盖这“剩余价值”里剥削的秘密，他们自己公然掠夺社会财富，极为贪婪，不择手段。在“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国家里，从上到下，各级都有官员要“从他掌管的权力中捞到一些好处，而在权力阶梯最底层的普通群众，则只能得到社会财富经过层层剥削后的可怜的余额。”（《刘宾雁自传》，1989年）

如果说“资本家”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中，还有属于自己应得的正当份额，那么通过“权钱交易”的机制，大小权贵们则完全是“不劳而获”，他们在社会分配关系中，只是构成了新的纯粹的“剥削”因素。现在许多人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和毛一样，不懂马克思，也不懂得历史，更不懂现代资本主义。那些大骂马克思的人，实在是帮了封建权贵们的大忙，为其张目却不自知。

甲：是啊！我也看过不少“批判”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文章，基本上“大同小异”，多数都回避不谈实际存在的“不合理分配”的社会问题，只纠缠在字义上的“批判”，或限于为“半夜鸡叫周扒皮”叫屈等等。我觉得，现代大资本家，如亨利·福特、华伦·巴菲特和比尔·盖兹等，在这个问题上的积极见解，比起只去为“周扒皮”鸣冤，

或聆听“才子”们“一知半解”的油滑“戏侃”，要有意义得多。

第六日 关于马克思的六道思考题

甲：我总结一下。你以上所讲，是把导致文化大革命的“毛刘之争”提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到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上来认识了。看来，不是刘少奇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相反，毛泽东才是马克思主义最凶恶的敌人！是他把我国引向了那场巨大的灾难。

乙：你说得对！基于最近和友人的交流，我这里想归纳为以下六个问题，把涉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部分再提得尖锐些，以便大家思考其中的合理成分。

一，马、恩若是共产狂人，为何又痛斥力主批判资产阶级的“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为什么那么看重当时德国所没有的“法国的生活条件”？他们对种种“反动的社会主义”的怒气，是否也适用于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的毛式“社会主义”？

二，如何理解马克思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三个前提，即：“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49年的中国，以及在同样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俄国、东欧、北朝鲜、越南、古巴、柬埔寨等落后地区，是否具备了这些条件？这是否是他们“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实践遭到惨败的共同根源？

三，毛搞他的“社会主义”，是否如马克思早年所嘲笑过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他也忘记了，“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走资派”刘少奇在这一点上的主张，是否比毛要高明些？

四，马、恩认为，即使“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十九世

纪的俄国也不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为什么？这是不是在批判和否定毛氏关于“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主观臆想？

五，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直言痛斥处于封建落后的德国中的假社会主义者，说他们“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

今天在中国，有没有这样自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自由主义”、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代议制国家”的主张、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竞争”、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资产阶级的法”、不但诅咒，还在竭力打压主张“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的人？这些主张究竟是否适合今日之中国？为什么？今天又有几个共产党人敢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讲？敢这么公开地在政治上拥戴“资产阶级”？马、恩是“走资派”的鼻祖么？

六，《共产党宣言》里，专门开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一节，其中写道：“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这里所说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指的是什么？“挥舞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又是指什么？他们所作的预见准不准？为什么中国人却没有能立即“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以上这些问题是我完全理解错了，还是马克思讲的根本就不对？请指正，越具体越好，越有针对性越好。请不要光轻松地甩给我一句“反正我不相信”或“完全不值一驳”，也不要“泛泛而谈”或“顾左右而言它”。

甲：谢谢你的问题！我会认真思考。现在许多人批毛，就大骂马克思，其实他们是在说些他们自己不懂的事。

乙：是的，马克思要封建专制社会国家去首先争取的“资本主义”，是那种完整的资本主义。她不但包括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竞争”，也包括政治上的“代议制国家”和“资产阶级的法”，更包括对体制监察的“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及“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这后二者就是今天许多“改革人士”“梦寐以求”的“宪政”，而这，却也正是坚持搞“权贵‘资本主义’”的人所极不愿意看到的東西。

甲：奇怪的是，对于马克思的这种主张，这两类人往往都是采取“无法否定”，但又“不愿肯定”的态度。究其原因，二者竟出于同一个，只是因为他是“马克思”！不过，他们各有各的“难言之隐”。在今天的语境之下，要能肯定马克思的一些话，不“因人废言”，这需要有勇气；而更多的人连正视的勇气也没有，干脆拒听拒看，仿佛那就不存在了。其实，马克思这里讲的，正是“毛病”之所在，是我们倒毛的利器。把马克思的这个意思搞明白，就能看清楚毛刘的路线斗争的“来龙去脉”。

乙：可笑的是，我问过许多党员，他们都不知道《共产党宣言》里有这些话，告诉他们之后，也仍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尽管每个中国字都认识。这真是个历史的悲剧和讽刺！

甲：如你所说，真追到马克思那里，就看得出，自四九年以来，共产党搞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到今日的“权贵资本主义”，都没有放弃封建的“专制和特权”，这实在是与马克思的主张“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乙：你说得对！我们探讨毛刘政见之争，把这场“官司”打到马克思那里，主要是为了去毛化。国人不明白这完整的“资本主义”为什么适合中国的情形？毛式“社会主义”为什么是反动的？因此在肯定刘的主张时，往往理不直、气不壮，好像说不过毛的那

些“豪言壮语”。现在人们顶多是同情刘的文革悲惨遭遇，一提他是“走资派”，就嘴软三分，矮了一截，或者，干脆认为他反正和毛是一党的，都一样。如果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也是批毛的，“走资派”在中国是合理的，认识到为什么中国必须要搞“政治改革”？那就可以在一个高层次上来倒毛，更深入地来批判“文化大革命”，而不是停留在仅仅对毛泽东和文革“血泪控诉”的水平。

甲：听你这样无顾虑地谈到马克思，我倒想起了一个人。你知道文革中因“思想罪”被“四人帮”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吧？他的妹妹，遇罗锦，旅居德国，前些日子她写了些有关遇罗克信仰的回忆。我摘了几段如下：

近年来，一些人便提出了遇罗克的信仰问题，一是说他思想有局限性，竟然信仰马克思主义；二是把他归结为“体制内”的。尤其是海外个别名人和大网站把马克思这个人描绘成恶魔时，那么，谁信仰过马克思主义，谁也就似乎是个不可理喻的人物了。

我的第二问：中共几十年来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是否是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是否真的一无所取？我只看到，那些真地通读了(甚至有反复读过多遍的)《马克思全集》的有独立思想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客观和审慎的，是多次地论述过马克思的著作里国人以前所不知的许多内容的；而那些从未读过马克思著作或是一知半解的人，说的话反倒是非常武断和绝对，他们彻底否定马克思，除了谩骂，却从未见全面地令人信服地阐述过。

我只能从另一面去看马克思是否是恶魔，或只是个活生生的人：德国不准许有希特勒的雕像和命名的大街，却对马克思的旧居、博物馆、著作和雕像都保存完好。以“卡尔·马克思”命名的大街，各城市都有，西德比东德还多。因为西德各城市的大小街道，尽是以著名的作家、科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的名字命名的。一旦经过了市政府的讨论和通过之后，也不会随着政局的变化随生随灭。德国始终是把马

克思视为哲学家和思想家对待的。……

与德国人的心胸相比，某些中国人应反思：为什么我们要么是圣人要么是恶魔，好象从未见过人似的？……

乙：她真是问得好！我也补充一句，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之后，《资本论》又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在欧美一度成为畅销书。西方有人评论道：“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观察到了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如何变成一种神话。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

甲：可是，相比西方人文传统的客观、理智、淡定和包容，我们有些人的头脑总是那么偏执、狂热、浮躁和武断，又喜“贴标签”、好“走极端”——非圣即魔，非红即黑，不知为什么？

乙：他们可能还是习惯文革的思维方式吧？文革中一些人自诩“立场坚定，斗志强！”我看他们是“头脑简单，形而上！”或者说，“有文无化，素养劣！”

甲：一点不错。文革中我们听够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刘少奇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罪该万死！”，以及“最最最”一类结结巴巴的嚙语。现在批判文革和批判毛的文字，披露史实多，血泪控诉多，自我忏悔多，这都很好，很有必要！但深入的、有说服力的理论分析还觉不足，文革中盛行的“大批判”思维方式似乎还在那里，只是谈论对象不同而已。这就难以防止旧物将来会“改头换面”、“卷土重来”，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们的头脑。

乙：正是这样！我赞同遇罗锦为其兄遇罗克的辩护、为马克思的辩护，虽然我个人并不完全认同马克思。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社会“要做些什么”，不一定行得通，但他说的封建主义社会“不能做些什么”，却为实践证明无误。因此，我不满再以文革的那套思维方式来对待他们，以“文革逻辑、文革语言”来“批判”刘少奇和马克思。

况且，晚年时恩格斯自己也有所承认，当时宣告“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看法的人，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主张把马、恩与毛做些切割，马克思其实是毛泽东的死敌，他也是我们今天反封建和去毛化的利器，而不应轻薄地对他们“嗤之以鼻”。

甲：可是，文革之后，不但刘少奇，连马克思也变得很臭，人们以为毛泽东搞的那些都是出自马克思的教唆，让他和毛一起挨骂，那倒是中了毛毒太深了。文革的思维方式，就是一个“左”字，我们现在应当警惕，要实事求是地看人、看问题，免得重蹈复辙。

乙：讨论社会问题，和讨论物理问题一样，我们首先要把基本概念搞清楚，否则，将形同“盲人摸象”，“各执一词”，却不得要领。当然，这些概念本身应当与时俱进，也绝对是可以争议的，但其内容的深度又决不是一个轻松“点评”就可以打发得了的。

甲：是的，搞物理的人最看重概念，否则，就做不出题目，也做不出实验。可是，如果搞社会工程的人基本概念错了，而且一错几十年，整个“国计民生”都受糟践。现在不少名人想问题、发议论，概念上却是一锅粥，逻辑也混乱，常有跳跃思维、偷换概念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追根问底，正本清源，先搞清概念，独立思考，不去跟风攀附。

乙：当年顾准先生在概念上抠得很深，提出不少独到的见解，发人深省，虽然并非“无懈可击”。但现在是个浮躁和狂傲的时代，我们还能够找到像王若水、顾准和遇罗克这样严谨又勇敢的学者吗？

甲：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讨论，有谁愿意参加？■

2016年1月初稿，12月修改。

作者邮箱：jshao_2007@126.com

【评论】

历史之人与历史之作

——科拉科夫斯基及其代表作述评

唐少杰

在思想史上，一位代表性人物往往意味着一部标志性著作，而一部标志性著作又常常意味着一位代表性人物，无论是“以人知书”，还是“以书立人”，“人”的影响和“书”的意义以及二者的“依存”，都成为思想史的“亮点”所在。当代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¹与他所著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Its Rise, Growth, and Dissolution*）²，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及其研究的一道“风景”。³

一

科氏1927年10月23日出生于波兰拉多姆，父亲是一位出版商、经济学者兼政论作家，纳粹德国入侵波兰后，被盖世太保杀害。科氏一家逃难到罗兹，流落到波兰东部一小村庄，科氏虽然被迫中学辍学，但在当地的图书馆里自学，最后通过了波兰战时处在地下状态的学历考试。科氏青年时期在罗兹大学攻读哲学，于194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后改称波兰统一工人党），1948年任罗兹大学逻辑课助教，1953年在华沙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50年被派往莫斯科访学，回国后任华沙大学哲学系讲师，1953—1959年担任该系现代外国哲学史教研室主任，1959年晋升为教授并任该系系主任。科氏出任过波

¹ 中国学界又有译者把此名译为“柯拉柯夫斯基”、“科瓦科夫斯基”、“科拉柯夫斯基”、“科瓦考夫斯基”或“克拉柯夫斯基”等，以下简称科氏。

² 中国学界又有译者把此书的书名译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根据该书的实际内容和衣俊卿教授的建议，我们认为，把该书的书名确定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为妥。以下简称《主要流派》。

³ 唐少杰主持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已由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年底出版、发行，此译著列入衣俊卿主编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

兰最主要的哲学杂志《哲学研究》主编，曾是波兰当时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以批判基督教哲学及教会思想而闻名，一度被视为1950年代波兰哲学界“红人”、“斯大林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波兰引人注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秀”等。然而，正是由于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批判和揭露斯大林问题的冲击以及稍后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波兰事件的影响，使科氏认识到斯大林问题所造成的精神危机，他开始否定和批判斯大林主义，批评波兰由于采取苏联模式而出现的诸多社会弊端。例如，通过具有讽刺性的、内含72条的《社会主义不是什么》等文章，科氏宣称斯大林主义是一种虚假的马克思主义信念，他要告别这种信念，把自己的理论旨趣确定为以“理智的马克思主义来取代斯大林主义的那种制度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应由过去那种被充当包罗万象、至善至美的“大全”体系转变为某种特定的态度、方法和范畴。1955—1957年，科氏主编了面向波兰青年知识分子的周刊《为了纯洁》，该周刊致力于批判“新阶级”、党内官僚机构及其粗暴手段，影响较大，后被迫停刊。自1956年之后，波兰思想界形成了强劲的并作为“非斯大林化”过程主流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它时高时低，持续了近30年，主要代表就是科氏。“和同时代的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执著于这样一种信念：在马克思主义的可信性和斯大林主义的行为之间可以划清界线。”¹科氏发表了诸如《责任和历史》、《卡尔·马克思和真理的经典定义》、《牧师与弄臣》等一系列文章，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了批评。科氏那时把波兰照搬苏联模式所带来的弊端归咎于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致使波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哥穆尔卡（W. Gomułka）1957年5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八届二中全会上斥责科氏“对修正主义向往，赢得了资产阶级报刊和托派报纸的重视”。²因而，科氏被解除了《哲学研究》主编。波兰秘密警察人员对科氏的讲演现场所进行的监视次数越来越多。当时波兰哲学界指责科氏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滑向了“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从60年代起，科氏“成了波兰的实

¹ T·朱特：《战后欧洲史》（上），林骧华、唐敏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387页。

² 转引自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8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677页。

实际上也是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最著名的和最直言不讳的领袖”，直至70年代，苏联及东欧国家理论界都把他当作“修正主义的代表”加以抨击。1966年，为了纪念“波兹南事件”十周年，科氏发表《十月的总结》，公开批评波兰政府错失改革良机，限制言论自由，使波兰成为一个特权阶级、低效无能和审查制度的国家，波兰党和国家都在衰退。因此，他被斥责为“资产阶级自由派分子”而被开除出党。随后，波兰22位知名的党内作家和知识分子联名上书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为“科氏同志”辩护，因为他是“自由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民主”的代言人。然而，这些上书者也因此而被开除了党籍。¹ 1968年3月，科氏因在一次讲演中激烈抨击波兰当局有关政策，被解除华沙大学的教职，后被允许离开祖国，先是去联邦德国，后去加拿大、美国，最后移居英国。自那时起的20余年间，科氏的著作被禁止在波兰出版、发行。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科氏重返祖国，对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和解体大做文章，他的思想和著作对于波兰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社会思潮以及公共知识分子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例如，当代波兰知识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米奇尼克1985年被囚禁时曾说过：科氏是“当代波兰文化最杰出的创始人之一。”²

科氏1995年在牛津大学荣誉退休，2009年7月17日在英国牛津病逝。英国广播公司（BBC）当天就作了报道。华沙大学校长K·哈瓦辛斯卡-马楚科夫（K. Chalasińska-Macukow）说：科氏的逝世“这不仅是波兰的，而且是世界的巨大损失”。³ 鉴于其对波兰的自由所做出的贡献，波兰国会当天为科氏的去世默哀一分钟，他的遗体被运回祖国安葬，受到了荣誉军人般的葬礼。⁴

科氏自1970年起被聘为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高级研究员，并长期兼任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此外，他还担任过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麦吉尔

¹ T·朱特：《战后欧洲史》（上），林骧华、唐敏等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第393页。

² 参见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崔卫平等译，自印本，2004年，第156—189页、第244页。

³ <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7-22/1786811.html>.

⁴ <http://www.latimes.com/news/obituaries/la-me-leszek-kolakowski21-2009jul21,0,2982668.story>

大学等教授，曾任英国皇家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艺术科学院外籍院士、法兰西文化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还是国际哲学学会等众多学术团体的成员。科氏获得过许多国际著名学术奖项，诸如“伊拉斯谟奖”、“麦克阿瑟奖”、“托克维尔奖”、“德国作家和平奖”、“托马斯·杰弗逊奖”、“波兰笔会奖”、“耶路撒冷文学奖”、“民主服务奖”以及“圣乔治勋章”和波兰国家最高奖“白鹰勋章”等等，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3年11月5日获得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首届“约翰·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¹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H·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在给科氏颁奖的仪式上是这样评价科氏的：“我们很少能够发现一位见地深刻、具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进行广泛的探索，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解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政治意义。出于深入的学术研究和不懈的探索，科氏明确指出，为了确立个人的尊严，必须保证必要的自由、对多样性的宽容和对超越的追求。他的声音对于波兰的命运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整个欧洲都有影响。除了他长期持续的反教条主义的哲学探索，他还写作高度可读的、富有挑战性的、有时候又带有讽刺意味和幽默感的文章。他有魅力、十足的机智，常常微妙自嘲，对于欧洲和美国的有时候显得迟钝的现代心态提出许多问题。他是一位真正的人本主义者，一位哲学家、思想史学者和文化评论家。在他全部创造生涯中，他提出重大问题的时候，思想真率而且深刻，因而我们设想以克鲁格奖来加以表彰。”²

科氏的主要研究领域涉及欧洲哲学、马克思主义、宗教、戏剧、文学评论等。从1950年代至21世纪最初的几年，科氏一直活跃于欧洲及美国的思想论坛，以波兰文、法文、德文、英文等写作，并能使用俄文和拉丁文等，主要著作有：《天主教哲学概况》、《通向天国之道》、《个人和无限》、《个人的权利反对人的权利》、《个人与上帝》、《宗

¹ 该奖旨在奖励在人文学科领域做出重大和深远研究的学者，用意在于对诺贝尔奖没能涵盖的人文学科领域上填补对大师成就最高荣誉之认可和表彰的空白，又称“人文诺贝尔奖”，奖金为100万美元。该奖项评选一般历时两年，由全球范围的两千多所大学校长、高等研究机关领导人和相关学科著名学者提名和评选。该奖项评选有三条标准：首先，其学术研究成果被同行公认为对该学科具有杰出贡献；其次，其成果在在人文学科中必须具有跨学科意义；再则，其成果必须对公众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当年终审的五位专家，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都一致推举科拉科夫斯基。

² <http://www.loc.gov/today/pr/2003/03-195.html>

教意识与教会的关系》、《别无选择的人》、《文化与崇拜物》、《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宗教》、《社会主义思想》、《胡塞尔与确定性研究》、《柏格森》、《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形而上学的恐怖》、《神话的在场》、《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等30多部论著和400余篇论文，还有三篇在世界广为流传的短篇故事集以及众多的不同文字的译著。¹

二

无疑，科氏的首要代表作就是《主要流派》），共有三卷、洋洋洒洒百万言的此书是科氏于1968年被解除大学教职以后开始撰写的。第一卷在波兰写成，第二卷和第三卷在英国写成，全书1976年至1978年首次以波兰文在巴黎波兰文学研究所相继发表，1978年首次用英文由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很快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普遍而强烈的反响。198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再版了此书。随后，《主要流派》的德文、荷兰文、塞尔维亚文等译本相继问世。《主要流派》全书共约有47章，论及约60位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代表人物或与马克思主义史相关的代表人物，近20个相关的流派、团体等，内容包括从早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经过第二国际和列宁主义以及后来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到20世纪中叶西方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和“马克思学”代表人物，再到南斯拉夫“实践派”、东欧“修正主义”和所谓毛泽东“农民马克思主义”等，论述了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

与其他马克思主义史研究者显著不同的是，科氏在《主要流派》第1章专门从哲学史

¹ 迄今为止，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已有下列中文译本：《柏格森》，牟斌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宗教，如果没有上帝……》，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形而上学的恐怖》，唐少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与魔鬼的谈话》，杨德友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关于来洛尼亚王国的13个童话故事》，杨德友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2013年修订版；《自由、名誉、欺骗和背叛——日常生活札记》，唐少杰译、衣俊卿校，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张彤译、魏志军校，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李志江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关于当代左派的文集》，姜海波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还有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1卷，马元德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理性的异化——实证主义思想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

发端的古希腊哲学柏拉图年代以及后来的基督教哲学和近代哲学开始，论述马克思主义与欧洲思想史的渊源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由来和兴起。这是科氏把他长期致力于欧洲大陆哲学史研究的功底和他从事的马克思主义起源研究的工作结合起来而相得益彰的一个范例，为其他人关于马克思主义起源的研究所难于企及。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领域非常少见的是，科氏还论述了索列尔（J. Sorel）所代表的詹森派马克思主义（Jansenist Marxism）、饶勒斯（J. Jaurres）所代表的灵魂拯救论（又译“救世神学”）的马克思主义（Soteriological Marxism）、戈德曼（L. Goldmann）所代表的发生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的马克思主义等等。据我所知，《主要流派》一书是迄今为止西方学术界论述马克思主义史的一部体系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和个性最鲜明的著作，被认为是西方学术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权威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是在其出版后至今的30余年里，在西方学术界、思想界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史的著述中，《主要流派》也可称得上还没有被超越的一部名著。西方有关人士把《主要流派》称之为“20世纪政治理论最重要的著作之一”。¹ 据悉，作为对《主要流派》的补充和深化，更主要的是对20世纪最后20年马克思主义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巨变，科氏生前已经完成了对这20年马克思主义史的论述的初稿，有待出版。

科氏在阐述到他那时已有130余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诸多代表人物、流派和学说的思想史或理论史，不仅表现出了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还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史的论题分类、年代划分、学派概述也具有许多精辟独到或深远广博的见解。科氏根据自己特殊的经历和体验，以“哲学人类学”为基础，对整个20世纪东、西方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状、传统与转型、问题与危机的研究提出了许多独特的、启示性的或是值得借鉴的观点，因而，他在“西方马克思学”乃至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史的领域中独树一帜，众所瞩目。例如，英国哲学家艾耶尔（A. J. Ayer）在著述《20世纪哲学》（*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时，对于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

¹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szek_Kolakowski

及其代表，他辍笔略过，因为他坦言他“不可能再改进L·科拉科夫斯基在《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中所作的论述了。”¹

《主要流派》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展开，叙述与评论并举，其思想和论点可谓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典型个案，因为，科氏本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经历了由一位共产党人兼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到徘徊在党的边缘并以所谓“修正主义者”的面目出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人道主义的“革新和改造”，再到被开除出党，流亡异国他乡，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这不仅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运动以及一些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中不乏其例，而且深切而又凝重地映现出5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史中尤为值得反思的某种现象及其内涵。²换言之，科氏与众不同的是，他晚年所体现的“西方马克思学”恰恰具有来自他早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底蕴和文化背景。至少，在最近30年人类历史上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当中，科氏的思想历程和思想影响都是颇为独特和有代表性的。

《主要流派》第一卷题为“创立者”（The Founders），该卷追溯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起源，确证了马克思主义与欧洲哲学传统演变以及欧洲人文主义精神发展的渊源关系；评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思想与早期著作，展现出他们早年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互动关系，标示出他们在创立马克思主义过程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的历程；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从巴贝夫主义到拉萨尔主义、从蒲鲁东主义到巴枯宁主义的几乎19世纪所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马克思《资本论》关于资本主义非人性化世界的剥削本质、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矛盾及其消除途径、关于历史发展过程的推动力量等重

¹ A. 艾耶尔：《20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页。

² 参见唐少杰：《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史及其研究的典型个案——科拉科夫斯基思想简评》，载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二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唐少杰：《科拉科夫斯基与20世纪下半叶的马克思主义史研究》，北京：《哲学动态》2000年第5期；唐少杰：《〈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译后》，广州：《开放时代》2000年9月号；唐少杰：《也谈马克思主义的主旨》，《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唐少杰：《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弄潮者——科拉科夫斯基及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剪影》，香港：《二十一世纪》2012年10月号133期。

要理论，论述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主要理论。这一卷的重要之处是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实质及救世论精神、关于马克思主义具有的“浪漫主义、浮士德—普罗米修斯（也可称之为英雄主义—救世主义）、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决定论”三个主旨、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思想差异等等综述性的观点。

第二卷题为“兴盛时期”（The Golden Age），该卷概述了马克思主义与第二国际的历史关系；评述了从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到普列汉诺夫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著名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论及了在我看来很难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诸如饶勒斯、索列尔等人把马克思主义与某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加以汇合的作法；综述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这一最早的也是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方方面面；介绍了这一时期三位知名的波兰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这在我国以往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中是很少提及的）；分别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与列宁主义这三者的崛起和发展的关系，着重分析了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卷的重点所在是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学说向社会历史实践的转换的诸多论点。

第三卷题为“衰落”（The Breakdown），该卷追溯了斯大林主义的缘起和发展，揭露出苏联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矛盾；回顾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的数次论战和斗争，概括出以斯大林主义为代表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缺陷；评价了托洛茨基十月革命后的观点和策略；批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畸形演变；还论述了从葛兰西、卢卡奇到马尔库塞、布洛赫的若干“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理论及特点，概述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转换和价值取向；最后列举了东欧、南斯拉夫、法国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出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状况、运动和趋势。这一卷的重要方面是科氏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史的总体性结论。¹

在我看来，科氏在《主要流派》一书中所阐述的下列五个方面，对于凸显马克思主义

¹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的内容简介还可参见陈学明、张志孚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111-134页。

历史发展和理解其理论演变的特性具有突出而深切的意义和影响。

（一）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原则

科氏认为，这一基本原则就是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它贯穿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的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科氏把马克思理论的基本内容归结如下：

1、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来自黑格尔的末世学问题（eschatological question）：人如何既能与自己又与世界相一致？马克思把人的“现世的实在”（earthly reality）而不是黑格尔的“精神”置于自己的世界观的中心，来展开自己的思想。2、马克思期望着人最终达到与世界、与自身和与他人的和谐一致，而达到这一点就要认识并克服人的现世命运中的异化及其根源。3、异化，主要是异化劳动，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特性。马克思不仅把异化视为某种破坏性的、非人的东西，而且也把它看作未来人类全面发展的某种条件。4、异化意味着人受到自己制造出来但却在外观上独立的物的压抑。异化导致私有财产和政治制度的产生，带来了个人之间的相互孤立，并且使国家创造了虚假的共同体。5、克服异化不是通过思想，而是要消除其根源。人作为实践存在物，其思想受制于实践的需要。规定人们头脑中的世界形象，不是来自对象的内在性质，而是人们面临的实践任务。6、超越异化是共产主义的别名，而共产主义是对人的生存的总体改造，是人的“类本质”的复归。共产主义意味着结束把生活领域划分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结束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区分，消除对政治制度、政治权威和政府、私有财产及其根源分工的需要，消灭阶级制度和剥削，治愈人的本质的分裂以及个人的畸形的、片面的发展，消灭异化力量，从而使人的生活本质与存在和谐一致，摈弃已有的虚假独立的社会意识。共产主义把哲学变为现实，并以此消除哲学。7、共产主义是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的实现。在共产主义下，人不再受偶然性摆布，人成为其命运的主宰，成为其自身命运的自觉的塑造者。8、共产主义不是与现实世界相对立的某种空想，不是历史上任何时间都可发明出来并付诸实践的某种理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当代历史的趋势，因为现今时代体现着最大程度的非人化，正在产生出走向共产主义的前提，而无产阶级代表着人类的需要来消灭非人化及异化。9、无产阶级将实现

共产主义，它的自觉性不是被动地意识到历史赋予它的作用，而是自由的自觉性，是革命首创性的源泉。由于历史的必然性实际上采取了无产阶级自觉性的自由首创形态，无产阶级就处于把历史的必然与自由融为一体的地位。10、共产主义是人类所有生活领域以及所有意识的最终改造。共产主义是以先进的技术发展和世界市场为前提，它将带来更大的技术发展，这一发展不是像过去那样转过来反对其创造者，而是有助于人们充分完成其作为人的自我实现。¹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科氏是以哲学上的人本主义来概括马克思的基本理论，因而，马克思主义就成为关于人对异化的克服和超越、人的解放、人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实现、人的自由等等的理论，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就是关于人的哲学。正如科氏后来追述的：“马克思主义以其纯人本主义（即从人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宇宙万物）的哲学吸引了许多人”，“因为它好像提供了一种理性的、而不是感性的历史远见。用这种观点看问题，一切都一目了然，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显然是表面的），不仅可以认识过去，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将来”。² 所以，人的问题是马克思理论的核心，人本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圭臬。

科氏的上述论点既是20世纪30年代首次发表马克思1844年手稿以来西方诸多学者用人道主义解析或“重构”马克思主义的延续，也是科氏本人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特殊经历的深刻反映。科氏本人正是由于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乃至人本主义化，告别了所谓传统意义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最终走向了批判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这些事实又一次表明：人道主义问题对于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实践如同一道分界线。西方诸多学者以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的若干问题以及所谓反人道主义倾向，诋毁上述运动及国家，认为在执政的共产党人那里奉行的不是马克思主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中，某一时期的确出现过对人道主义加以理论上挞伐和实践上践踏的事实或现象。这不仅给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创伤，而且给马克思主义的生

¹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 pp.177-181,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8.

² T. 舒尔茨:《昨与今—战后世界的变迁》，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118—119页。

机造成了窒息。更为令人注目的是，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每每都是以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为理论契机，对于僵化的某些社会机制和僵滞的意识形态教条进行发难，变革了若干社会运行模式以及人们的思维模式，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崭新的局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人道主义问题曾一度独领风骚地从实践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别有洞天的新阶段，但这一问题在理论上至今并未得到真正、彻底、深入的讨论和解决，并没有取得应有的理论成就。总之，回眸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面对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依然要进一步反思和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这主要分为三个方面：1)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是相互绝缘、格格不入的，还是部分地相互包容、相得益彰的？2) 马克思主义是否定、拒斥人道主义，还是改造、发扬人道主义？是建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化的人道主义（不是人道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所谓非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3) 人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占有什么地位？有无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人本主义（如今天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对于所有这些方面，《主要流派》都给我们提供了有特殊意义的借鉴。

（二）马克思主义的主旨

科氏认为，在马克思的学说里具有某种程度的紧张关系（tention，又译“张力”），这既表现在有着不同倾向的思想之间，也表现在被马克思综合成一体的诸多思想资源之间。由此，马克思主义具有三个主旨（motif）。¹

1、浪漫主义主旨。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的主要方法上，马克思继承了浪漫主义

¹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 pp.408-416,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8. “motif”一词来自于法语，并在英语中通用，含有“主旨”、“动机”、“动因”等之意。我认为，根据科拉科夫斯基在《主要流派》著述的上下关联和观点脉络，“motif”一词应该译为“主旨”，而不应译为“动机”或“动因”。从文化学以及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动机”、“动因”更多地是指某种特定的实在活动或实践行为的缘由或初衷，而一般不是用来指某种理论或学说的缘起或前提。必须指出的是，科氏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旨”之际，更多地是从论的相对横的形态，而不是从史的相对纵的过程，来阐释马克思主义本身与以往某些学说或思想所具有的相似的“主题意义”或“理论宏旨”。因此，我认为，路薇把“motif”译成“动因”，把这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旨”译为“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三大动因”，这种译法不确切；见陈学明、张志孚主编：《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名著提要》，上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第112-115页。赵司空在论及“科拉科夫斯基带有强烈‘新马克思主义者’印记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时，把“motif”译成“动机”，见陈学明主编：《20世纪释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第2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1页。还可参见唐少杰：《评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主旨说”》，北京：《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11期。

运动的思想。浪漫派“哀叹”工业文明造成了人类旧有的传统共同体的消失和个性的丧失，抨击这种文明使人异化为无个性的、无名状的“物”，主张回归到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没有诸如国家制度、货币等力量乃至一切中间东西介入的完全和谐的状态。在这样一种每个人自由而无拘无束地与整体相同一的社会里，强迫和控制没有必要，以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来换取另一部分人的发展也不可能发生。马克思采纳了浪漫主义的思想，并且在对共产主义的勾画中也赋予了它浪漫主义上述的乌托邦色彩。马克思与浪漫主义不同之处在于：他不是通过怀旧复古以便破坏工业技术的发展，而是肯定这种发展并以其辩证的过程来使工业技术成为实现未来理想的基础。

2、浮士德—普罗米修斯主旨，也可称之为英雄主义—救世主义主旨。这种主旨就是坚信人们作为自我创造者所具有的无限力量，鄙视传统，鄙视崇拜过去，坚信历史是人类通过劳动完成的自我实现，并且确信明天的人类是从“未来”中得出自己的“诗情画意”。这一主旨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它以集体的普罗米修斯即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来结束过去、创造现实和开辟未来，亦即拯救人类，拯救世界。这种主旨所凸现的拯救是人对自己的拯救，而不是上帝的或大自然的拯救。人的自由就是人的创造性，而集体的普罗米修斯原则上能够实现对人们所生活的世界的绝对把握。

3、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和决定论的主旨。马克思谈论的社会规律虽然不同于自然规律，但却有自然规律那样的客观作用。马克思谈论的社会规律是以解释迄今为止的历史即人类“史前史”为根据的，尽管这些社会“规律”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强加于人之上的，是人们对自我的创造无法控制，甚至是自我异化的支配方式。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不仅是认识了这些规律，而且也是在实践中把握了它们。从这时起，必然性才有可能向自由转化。马克思为探讨社会规律而使用的诸多概念是非评价性的概念。例如，马克思最喜爱的箴言之一“怀疑一切”就体现出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

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主旨的论点扩大了传统意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源。他强调，旨在批判过去的第一个主旨主要来自圣西门、赫斯和黑格尔；旨在勾画未来的第二

个主旨来自歌德、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关于实践与自我意识的哲学；旨在结束过去的第三个主旨来自李嘉图、孔德（尽管马克思嘲笑过他）和黑格尔。而这三个主旨都有黑格尔的影响。尽管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60年代比40年代更注重第三个主旨，但前两个主旨还是持续不断地影响到马克思著述的方向、应用的概念、提出的问题 and 所作的解答。实际上，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主旨的论点依然是确立在把马克思主义加以人道主义化乃至人本主义化的“革新和改造”之目的上的。

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主旨的观点改换了自恩格斯以来关于马克思主义由三个部分组成的“正统”观点。在科氏看来，把马克思主义划分成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这是恩格斯等人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用科学主义凌驾于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倾向，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实用主义化的做法。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的初衷。科氏反复强调，马克思的思想与恩格斯对它的阐述乃至列宁对它的应用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对立。至少，恩格斯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是大相径庭的。

与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家”一样，科氏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已过时。科氏指出，马克思本人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和批判依据的只是19世纪50年代的资料和数据，显然不适用于自那时之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巨变。“科学社会主义”已被其后来的实践改换成弊端丛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主义似乎只剩下了哲学。在科氏那里，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是等同的、混用的。科氏以他自己的角度所展示的这种哲学，不仅仅是它与思想史上诸多人文流派的关系，即它是历史上某种人文传统的延续，具体言之，则是浪漫主义、普罗米修斯思想和理性主义及决定论思想的延续，而且最主要的在于，科氏以这三个主旨凸现出的是所谓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的性质、救世论的传统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取向（科氏在后来的章节中多次论及）。科氏的三个主旨论由此也就从理论上试图消解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意义，尽力给马克思主义填充某种经过他“修正”的诸多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相混杂的内容。科氏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旨论，尽管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领域可谓一种崭新的视角，但是，此论却关系到如何

看待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特别是马克思自己理论的实质。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

在科氏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是到了第二国际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25年），与形形色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基督教徒明确区别开来之后，才确定下来。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接受下列原理：

1、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趋势已演化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的自然趋势。2、社会主义意味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因此消灭剥削和不劳而获以及由财富分配不公而带来的种种特权和不平等，消除种族、国家、性别和宗教等方面的歧视，消除常规军。人们享有充分的平等、民主和自由。3、社会主义代表的是所有人的利益，但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中坚只能是工人阶级。4、无产阶级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进行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必须自己组织起独立的政党。5、通过渐进的改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的，然而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各种改良来提高自己的战斗力。6、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是基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革命不是少数密谋者的军事政变，而是绝大多数劳苦群众的事业。7、无产阶级的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是一致的，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一项国际性的，至少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斗争。8、人类历史上，技术的进步是导致阶级结构变化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变化又决定了政治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9、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纲领，而且是一种基于对现实进行质疑的科学分析的世界观。¹

显然，科氏把第二国际之际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当成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科氏归纳的上述九点正如他在后来的论述中所涉及到的，关系到第二国际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标准的三个方面，因为在他看来，在第二国际之后，很难再用统一不变的、严格规范的标准来定义马克思主义者了。理由如下：

一是马克思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的关系。尽管社会主义是一个比马克思主义更为宽泛、悠久的范畴，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使社会主义成为一项真正的世界历史的课题和事业。

¹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 pp.4-6,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8.

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在为实现和建立社会主义事业的活动中，即使没有共同的哲学，也肯定有一致的价值追求和相似的奋斗目标。双方的关系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各自来讲，都非同小可。例如，20世纪30年代，在欧洲、在德国，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没有能够建立起遏制或消除法西斯势力的统一战线，就是一个极为沉重而惨痛的历史教训。

二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对于后者，科氏大加抨击。他认为，后者的标准与以往经典标准的最大不同是把国家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的或首要的标准，并且这种模式化了的标准既排除和否定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意义和作用，也禁锢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时的生机活力和批判锋芒。毋庸置疑，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然而它却是20世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用来衡量马克思主义者的尺度。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是，为什么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攸关重大？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向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及转化的种种可能的和必然的条件又是什么？

三是马克思主义者整体内部的分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确切地说，第二国际的分化和破产，使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标准遭到裂变。仅过数年，十月革命的胜利给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带来了转机。到了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流派及理论的丰富多彩已经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标准的多样性或多元性成为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最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们自己内部的争论和作用，使得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处在一个变动不居、生成开放和不断深化的历史动态之中。科氏的上述九点对此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历史视角。

（四）关于列宁主义的评价

科氏认为，经过了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对于列宁主义应重新评价。他推翻了斯大林时期把列宁主义加以神话的若干说法，在《主要流派》中多处对列宁主义大加批判。现综述如下：1、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而只是其发展的一个流派。它是仅仅适用于俄国的“农业共产主义”。无论对于理解和解决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还是殖民地

各国的社会发展问题，列宁主义都是不可接受的。2、列宁主义没有继承作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它与人道主义、人权和自由格格不入。3、列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列宁的伟大和天才不在于其理论和预见，而在于其行动和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和机会来夺取政权。列宁是实干家。当列宁需要某种理论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他会毫无顾忌地篡改和伪造马克思的学说。4、列宁主义是一种极权主义理论。列宁本人是极权主义理论家。列宁的一系列政论文章和观点，他的诸多政治举措和其学说的实践，都表明了极权的特征。5、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延续和组成部分。列宁以其理论和行为为斯大林后来的恐怖统治制造了条件。“列宁时代”与“斯大林时代”之间的实质区别不在于前者那里党和社会享有自由，而在后者那里没有自由，区别只在于：在斯大林的统治下，苏联人民的整个精神生活都沉浸在谎言与欺骗之中。¹ 后来，科氏对苏联国家意识形态做了一个概括：“这种意识形态被指望用来铸造人民的思想，但是它只能行之一时，因为它变得如此虚弱不堪、荒谬可笑，以致没有人相信它，被统治者不相信它，统治者也不相信它。”²

科氏对列宁主义的否定和敌视是他全力批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依据。科氏贬低列宁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地位，恰恰有可能忽略列宁主义构成20世纪东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因为一大批不发达国家或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正是通过列宁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联结起来。这些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接受的是列宁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主义不仅开辟了在所谓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天地，而且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普及。

列宁主义是否为适用于俄国的“农业共产主义”的说法，这是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社会乃至东方社会能否结合和怎样结合的争论的继续。当年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在此问题上的争论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受到民粹主义的掣肘。当年列宁主义者与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战影响，一直

¹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 pp 416-420; Vol. II, pp. 381-384; Vol. II, pp515-527,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8.

² <http://www.nytimes.com/2009/07/21/world/europe/21kolakowski.html>

延续到今天如何看待落后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之际和成功之后所经历的沉重坎坷。这个问题的争论在苏联解体之后又以一轮沉重的历史方式再现出来。

科氏对列宁主义的全盘否定是他全力讨伐斯大林主义的必然前提。¹ 斯大林问题不仅对列宁主义而且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来说，都是一个至关全局的问题。科氏对斯大林问题的见解和评价无疑带有他个人浓重的生活经历和感情色彩。科氏在20世纪70年代对斯大林问题的一味否定，并不能解答斯大林问题为什么是20世纪中叶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所存在的一个普遍性的现象和事实。

科氏20世纪70年代对列宁主义的评价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巨变之际又一次得以成为热点。这尽管表明了科氏对苏联模式批判的前瞻性，但是这种批判已经超出了科氏本人的范围，仿佛汇成了对具93年历史的苏共命运和74年历史的苏联结局进行讨论和反思的国际性的思潮。在此，进一步提出的问题是：列宁主义的挫折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意味着什么？它对马克思主义的走向和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可以确信，列宁主义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及其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持久而常新的话题。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结论

科氏在《主要流派》“跋”中写道：“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最大的幻想(the greatest fantasy)。它是一个呈现出完美统一社会远景的梦，这种社会使人类一切愿望都得会满足、一切价值都会实现”。² 这一说法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只是幻想。必须区分出作为对过去历史的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对于人们的知识储备和丰富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很有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同样承认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作为信仰而不可修正，即它相信只有当过去的历史按照未来的历史来解释，历史的过程才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说，那些业已存在的东西只有当它们具有对那些还没有产生的东西的预知时，才是可以理解的和有价值的。如果没

¹ 参见科拉科夫斯基：《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根源》，引自李宗禹主编《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29—51页。

²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II, p523,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8.

有对未来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也就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具有宗教的功能和特征。¹ 然而，“作为阐释性的‘体系’，它死亡了，它已不能提供任何‘方法’用来有效地解释现代生活、预见未来或培植促成乌托邦规划”。² “现在，马克思主义既不解释世界，也不改变世界，它只是一套为组织各种利益而服务的口号，其中的大多数与马克思主义最初的口号有天壤之别。”³

从理论上说，科氏的这种结论是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乌托邦一类的学说，归结为在人类早期思想史上，尤其是基督教史上曾经盛行的拯救论（soteriology）和末世论（eschatology）之类的东西，这在《主要流派》中是一以贯之的，是显现于《主要流派》始终的基调。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科氏眼里成为不可实现的信仰教条，成为与思想史上某些盛极一时的学说殊途同归的东西。科氏格外地注重现代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困难和危机，着力强调它在20世纪下半叶遇到了不可避免的“衰落”。这种预见性的结论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初确实经过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得到了某种证实。

从实践上说，科氏的这种结论难以成立。尽管在21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的境遇不可与它在20世纪的兴盛时期同日而语，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没有终止。就世界范围而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还没有告罄，还依然处在生成和转换之中。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了自己的第一个世纪（19世纪）和第二个世纪（20世纪）的发展及应用之后，一定会迎来它自己以崭新形态出现的第三个世纪（21世纪）。

应该指出的是，《主要流派》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演进的分析 and 论述，是整个《主要流派》中最为薄弱的方面。诚如科氏所言，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和理解大都是通过第二手或第三手的资料来进行的。科氏对于毛泽东的所谓“农民马克思主义”的定性及所作的相关概论，我相信，中国广大的读者不难看出其局限性。

¹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II, p526,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8.

²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II, p529,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8.

³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II, p530,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78.

三

在衣俊卿教授主持编辑和出版“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译丛”之际，他在这套译丛“总序”即《全面开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中明确地谈及这套译丛既要“包括与我们的观点接近的著作，也要包括那些与我们的观点相左的著作”，诚如衣俊卿教授所言：

“以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为例，他在这部著作中对不同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进行了很多批评和批判，其中有一些观点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必须加以分析批判。尽管如此，它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之一，如果不把这样的著作纳入‘译丛’之中，那么我们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很大的片面性。”

在今天的中国，出版、发行《主要流派》中译本，至少有三点值得关注：首先，如何理解和把握“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最有代表性的人物非科氏莫属也！尽管这一在东欧1950年代至1970年代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思潮最终走向了远离或告别马克思主义的结局，但是，它的出现的确开阔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话语、视野并且促进了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嬗变、转型，它的演进并没有背弃或否定广义上的社会主义，它的取向依然是以某种道德伦理的、民主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来审视和解决人类生活问题。这一点突出体现在2002年科氏发表的题为“社会主义还剩下什么”一文中。他指出，虽然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预言都失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理想的消亡。他把马克思的预言与社会主义传统剥离开来，因为马克思曾预言的市场经济社会的阶级对立将导致中产阶级消失、工人阶级的绝对贫困、无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利润率下降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的崩溃、市场将阻碍技术的发展这五个方面，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后来的社会主义正是基于这些错误的预言而有了意识形态的支柱，它们取消市场和彻底国家化的做法只能导致极权主义和极端的不平等。科氏断言，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但是社会主义传统观念本身并没有消亡。因为，这种传统观念是丰富的，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表现为追求平等、公正、普及教育、注重公共福利、消除民族歧视、妇女解放、自由等

等多种进步的价值和运动，代表着当时欧洲政治生活最优秀的方面。在列宁—斯大林主义导致的社会主义被极权主义所垄断的局面结束之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及其运动带来了众多的社会改革，促使政治环境日益改善，保证现有的福利国家正常运行，维护社会正义，解决市场所无能为力的人类紧迫问题。科氏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作为社会哲学或道德哲学，它建立在人类手足情谊的理想之上，如此的社会主义永远只能是价值理想，而决不能由制度化手段来补充，决不能作为制度而存在。¹

其次，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世界主流文化及主流话语下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主要流派》一书仿佛历久弥新，其学术价值和思想影响随着岁月的演化愈益凸显、深远，显而易见，这些都是与该书所论及的马克思主义诸多问题、与2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特别是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乃至“冷战”时代的结束息息相关的。这使得《主要流派》一书在其出版20多年之后，又一次成为关注的热点。这主要体现在科氏于2003年11月获得了前面所述的首届“克鲁格大奖”之后，2005年美国纽约的诺顿出版公司再版该书前后所引起的反响。该出版公司把《主要流派》三卷本汇集成长达近1300页的一册，在该版封面的天头和底端上，分别印有“经典文本 汇集一册”和“现代人文学的一座丰碑”（引自英国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的评语）的字样。在该版上不仅有该书作者2004年撰写的新版序言和新跋，而且在该版的扉页和封底上都印有高度评价该书的评语。²从这些评语中不难体味出：马克思主义在近几十年里所遭遇到的挑战和危机，直接就是

¹ <http://www.firstthings.com/article/2007/01/-what-is-left-of-socialism-15>.

² 在该版扉页上，印有十处有关人士或书评的评语，转述如下：

托尼·朱特（Tony Judt）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的评语：“或许（科拉科夫斯基）应该被视为20世纪文人共和国的最后一位杰出公民……科拉科夫斯基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的范围之广，很难在一篇短短的书评说清楚。本书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即使不是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史论，但它无疑是迄今为止最为宏大的一部马克思主义史论。……阅读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必将让人获益良多。”

萨拉·莱尔（Sarah Lyall）在《纽约时报》（*New Times*）上的评语：“（科拉科夫斯基）三卷本对马克思主义剖析的著作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最具权威性的著作。”

约翰·格雷（John Gray）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 Supplement*）上的评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是关于西方思想史上一段重要经历的无可匹敌的百科全书。”

马克思主义制约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挫折和失败，反之，亦然。无论是从学理的价值上还是从实践的意义上，《主要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更不用说非常广泛地）映现出西方世界主流文化及主流话语下的马克思主义问题的描述和评价、建构和取向、职能和命运。最为集中地代表这一点的就是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托尼·朱特在2006

米洛拉迪·德拉科维奇（Milorad Drachovitch）在《听众》（*Listener*）上的评语：“本书毫无疑问是有史以来对马克思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最完整、最令人满意的研究著作。”

西尼·胡克（Sidney Hook）在《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上的评语：“本书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新纪元。”

斯蒂文·鲁克斯（Steven Lukes）在《纽约书评》上的评语：“本书以清晰而准确的阐释，连贯而高水平的分析，令人印象深刻地考察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并在充满激情的同时严格忠于原典，展现了阐释和分析的本真面目。”

保罗·霍兰德（Paul Hollander）在《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上的评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一书既是马克思主义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分，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成熟的批判和祛魅。……只要思想还能对历史和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著作就会依然具有重要意义而受到好评。”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上的评语：“本书以单卷本的大部头著作罕有的完整性和清晰性，阐释了马克思主义自发端以来到20世纪所经历的发展、实践以及相关的理论家们。”

杰弗里·霍索恩（Geoffrey Hawthorn）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上的评语：“本书具有卓越的清晰性和力量性，做出了最尖锐和最敏锐的判断，其质量较它所论及的几乎所有著作更胜一筹。总之，这是一部杰作。”

《安提阿评论》（*Antioch Review*）上的评语：“这部巨著中充满了智慧的正直和博学的光辉。”

在该版封底上，列举的评语有：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评语：“一部由西方最敏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所著的里程碑式的杰作……本书将会持久地成为这一领域的必读书目。”

诺顿出版公司的评语：“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这部20世纪伟大的历史著作，如今最终汇编成一卷，本书概述了马克思哲学的发展和马克思追随者们的贡献。这是一部超越智慧的先知般的著作，是理解现代政治历史的必备书目。”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斯·H·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的评语：“我们很少能够发现一位见地深刻、具有反思精神的思想家，这样的思想家进行广泛的探索，对于自己所处时代的重大政治事件的见解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政治意义。”

托尼·朱特（Tony Judt）的评语：“或许（科拉科夫斯基）应该被视为20世纪文人共和国的最后一位杰出公民……科拉科夫斯基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的范围之广，很难在一篇短短的书评说清楚。本书是无与伦比的。”

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的评语：“科拉科夫斯基作为哲学家、史学家、神学家、政治科学家和文学评论家，在思想界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

阿兰·瑞安（Alan Ryan）在伦敦《泰晤士报教育副刊》（*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上的评语：“本书卓越的原因不胜枚举。……本书的绝对价值无以复加。……这是一部独具特色而又引人入胜的杰作。”

年9月《纽约书评》上为新版《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所写出的评论，题为《告别那一切？——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与马克思主义的遗产》¹

再则，如何审视和解决世界范围内的左派思想理论与右派思想理论之争？在《主要流派》英文版首次发表的1978年，科氏给自己的期望是成为一个“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² 因为，保守主义者相信：1、在人类生活中，每项改革都必须付出代价，自由的获得和平等的实现此消彼长，一个把全部平等和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社会是不可能的；2、我们不知道多种不同的社会生活传统方式——家庭、利益、民族、宗教共同体在何种程度上是不可缺少的；3、要消除一切社会制度缺陷的观念和尝试不仅是不可确信的、与经验相悖的，而且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它们通向极权主义。自由主义者相信：1、以安全为目的来强调国家的作用是有用的，但是对安全和国家的重视永远不应该与自由混淆；2、人类共同体不应该阻碍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展；3、平等本身不是实现自由的目的，而是获取自由的手段。完全的平等是自取失败的理想。社会主义者相信：1、对自由的限制只是对纯粹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经济活动自由的限制，而不应该是对更高形式的自由的限制；2、不能仅仅因为一个完善的、无冲突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就认为每一现有的不平等形式都是不可避免的、每一赚取利润的方式都是正当的；3、应该鼓励对经济进行社会控制，即使付出的代价很大，为了防止对自由进行威胁也是十分必要的，这些控制必须在代议制民主内实施。尽管科氏本人并没有充分解释把这三种主义汇合成“一个信条”的可能性，没有具体论证把上述这三种主义各自具有的规范和价值能否结合、为何结合和如何结合起来的必然性，但是他毕竟明确地理解到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的所长所短，试图把数百年来相互冲突、相互砥砺甚至相互隔离的上述三大主义融为一炉，加以熔冶锻炼，这也就有可能为进一步反思或更好地转化包括当今中国在内的世界范围的经久不衰的左派与右派、革命与改革、激进与温和、现代性与现代化、未来与传统、理想与

¹ 托尼·朱特：《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林骧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41—160页。

² L. 科拉科夫斯基：《如何做一个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者：一个信条》，载《经受无穷拷问的现代性》，李志江译，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4—246页。

现实等等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基点。¹

的确，今天仅仅以反马克思主义来定性《主要流派》一书则过于简单了；而对《主要流派》提出的问题和所带来的影响视而不见或置之不理也是不足可取，更不能像过去那样对《主要流派》采取轻率、粗暴和庸俗的“大批判”的“处理”。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要流派》折射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特定命运，成为交织着这种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特定体现。对于我们而言，在《主要流派》出版30多年之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在世纪之交处于前所未有的低潮之际，结合马克思主义160多年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研读《主要流派》一书，正视并重视《主要流派》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所做出的诘问、批判、责难和否定，我们不得不说它给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给所有关注马克思主义或者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某种命运联系的人们提出了深切而多重的思考课题。这些的确都有待于我们做出进一步的探讨和解答，一言以蔽之：马克思主义者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马克思主义，而问题在于改造马克思主义！

正如科氏所认为的，当今世界，人们不会对马克思主义的每一问题有两种完全相同的看法，我们理所当然地不会苟同于他本人的全部观点和看法。我相信，广大读者会对此书得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且这种评价会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及其演变不断地得到修正、充实和提高。十分可喜的是，国内已经有十余部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或相关的著作在评述马克思主义发展时论及到了科氏及其《主要流派》的观点和影响。² 一些学

¹ 参见孙传钊：《左派乎？右派乎？》，北京：《读书》，2005年第1期；

²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衣俊卿等著：《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衣俊卿：《人道主义批判理论——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黄继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8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年；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廖惠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六大思潮初探》，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陈学明主编：《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第2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等等。另外，还可参见涉及到科氏著作和观点的译介性的文献：[南]普·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胡文建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英]汤姆·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美]罗伯特·戈尔曼编：《“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赵培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英]凯蒂·索珀：《人道主义与

者、专家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在论及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史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史时，《主要流派》一书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可忽视的。令人欣慰的是，黑龙江大学已有关于科氏思想理论专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通过，并已出版。¹可以预见，随着我国学者对科氏著作的进一步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中国学术界、思想界对科氏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会达到新的水平。²■

【文摘】

毛泽东的农民马克思主义³

（波兰）科拉科夫斯基

中国革命是20世纪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一革命的理论即众所周知的毛主义，于是便成了当代思想论战中的主要成员之一，不管其自身的理论价值如何。若用欧洲的标准衡量，毛主义的意识形态文献，尤其是毛本人的理论著作，其实显得极端原始和蹩脚，有时甚至很幼稚。与之相比，连斯大林都给人一种权威理论家的印象。

反人道主义》，廖申白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87-89页；[英]霍华德等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顾海良、张新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4页；[美]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6页；[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1页；[美]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范岱年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21页。

¹ 胡蕊：《文化的张力与理论的命运——科拉科夫斯基的青年马克思观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继红：《社会主义理想的初步实践探索——科拉科夫斯基的列宁主义观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李晓敏：《现代性危机与基督教文化精神——科拉科夫斯基宗教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² 参见：衣俊卿：《科拉科夫斯基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12期；衣俊卿：《南理论界批判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塞文版第三卷出版》，《国外社会科学动态》，1986年第4期；赵司空：《各主要国家及地区年度报告——中东欧》，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7页；周嘉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与西方“马克思学”的神话破灭——以科拉科夫斯基为例看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苏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胡蕊：《评科拉科夫斯基的马克思哲学“三大动机”说》，《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³ 此文选自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著，侯一麟、张玲霞译，唐少杰、魏志军校《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三卷，第十三章，第六节。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

但是，下这种判断要小心。不懂中文、对中国历史文化只有疏浅知识的人（作者本人即属此列），无疑不能把握这些著作的全部意义，而熟知中国思想的读者才能察觉到各种联想和引喻。在这方面，必须依赖专家的看法，但专家们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下面的评述比本书中其他部分更多地基于第二手材料。但是，我们开篇就可以声明，尽管毛主义有其理论主张和哲学论断，但是毛主义首先是一批实践格言，这些格言在某些方面已经证实对中国的情况是卓有成效的。

今天人们所说的毛主义——按中国的说法是“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其起源可追溯到几十年前的历史。中国共产主义的一些典型特征与俄国共产主义不同，这在20年代末初露端倪。但是，只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于1949年取得胜利后，他们的意识形态，尤其包括毛的乌托邦思想，才开始定形，而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只是在50年代或50年代末以后才发展。

成熟的毛主义是激进的农民乌托邦，毛主义者使用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但所用词语的主要意义却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这毫不奇怪，因为这个乌托邦与欧洲的经验观念关系甚微。除了两次访问过莫斯科外，毛从未离开过中国，那时他已是新中国的元首。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一门外语都不懂，对马克思的知识或许也相当有限。例如，他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自居时，习惯说任何事情都有好坏两方面。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嘲笑过这样的辩证法是小资产阶级的胡言乱语，也许就不会这么说了。再者，他若知道马克思谈论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他也会讨论这个问题的，但他的著作却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的两篇哲学论著——《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把他在斯大林和列宁著作中读到的东西变成大众化的简释，再加上一些适应时局所需要的政治结论。换一个温和的说法，要怀着极大的好意才能在这两篇著作中察觉到某一深刻的理论意义。

可是，这并不是关键。中国共产主义的重要性不取决于其信条的知识水平。毛即使不是20世纪人民中最伟大的操纵者（manipulator），也是最伟大的之一。他用于目的的意识形态由于有效而影响深远，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也是一样。

共产主义在中国是自1912年¹推翻皇帝开始的一系列革命事件的继续，是从那时可追溯几十年的历史尤其是1850年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之一）²的发展结果。毛是这场革命中第二阶段的总建筑师。这场革命像在俄国一样，不是在共产党人主持下开始的，而是源于列宁所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大庄园分给农民，把中国从外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消灭封建制度。

毛泽东（1893—1976）是湖南省一位富裕农民的儿子，在乡村里上小学，初步接触中国文学传统，对学问发生了兴趣，把他带入了中学。年纪不大，他就加入了孙中山的革命共和国——国民党。在共和党军队里当了一段兵后，继续学习，直到1917年。在这些年里，他还写诗，后来在北京的大学图书馆工作。³在这时，他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民主主义者，但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国民党的目标是从日、俄、英帝国主义的摆布下解放中国，建立立宪共和国，并通过经济改革改善农民的命运。1919年骚乱刚刚爆发后，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北京成立。1921年6月，在一名第三国际特派员的主持下，这个小组的12名成员，其中包括毛，成立了中国共产党。⁴按照第三国际的指示，党起初与国民党密切合作，争取获得中国幼小的无产阶级的支持（1926年城市工人占总人口的二百分之一）。在1927年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后，在发动一系列起义以及与脱离的国民党左派达成协议（entente）的试图失败后，共产党人改变了政策，称其前领导人陈独秀为“右倾机会主义者”。虽然遭受到巨大伤亡，但是党继续集中力量争取工人。然而，毛很早就提出转向农民，组织农民军队。党内这两派都强调反帝、反封建这两个目标，这时几乎还没有任何具体的共产主义前景的迹象。毛在其家乡湖南着手组织武装农民运动。在占领的地区，农民武装没收大地主的财产，消除传统制度，建立学校和合作社。

¹ 原文有误。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推翻清朝，1912年1月1日成立中华民国。——译者注

² 原文有误，太平天国起义始自1851年1月。——译者注

³ 应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译者注

⁴ 作者有误。应为13名代表，这13名代表来自全国各地，不是仅仅来自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为1921年7月。——译者注

在这之后的20年里，毛在远离中心城市的乡下度过。他很快不仅成了农民游击队的杰出的组织者，而且成了中国共产党无可争议的领袖——世界上唯一不是靠莫斯科的支持而取得职位的共产党领袖。在这充满辉煌胜利和戏剧般失败的20年里，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国民党、日本侵略者作战，他在一段时间内与前者一起抵御后者。共产党人在所占领区组织了他们未来国家的基础，但继续强调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继续号召成立包括全体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即不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1949年胜利后最初几年，党仍然采用这条路线。

1937年在游击战争期间，毛在延安党的军事学校发表了两次哲学演讲，这两个演讲几乎构成现今中国人民能得到的全部哲学教育。在《实践论》（*On Practice*）的演讲中，他说，人的认识起源于生产实践和社会斗争，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思想毫无例外的都是由阶级决定的；实践是真理的标准；理论以实践为基础，为实践服务。人通过感官感知事物，然后形成概念，再通过概念理解人看不见的事物的本质；要认识一个对象，就必须参加⁴⁹⁸它的实践活动：我们吃了梨子，才知道其味道；只有通过参加阶级斗争，我们才能认识社会。中国人民从在“表面的感性认识”基础上反对帝国主义开始，后来才达到理性认识阶段，即认识到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因而能更有效地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指导行动。”¹马克思主义者必须使自己的认识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否则就会沦为右倾机会主义；然而，如果他们的思想超越发展阶段，错把想象当成现实，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假左派高谈空论的牺牲品。

《矛盾论》（*On Contradiction*）的演讲试图借助于列宁和恩格斯的语录来解释“对立统一规律”。形而上学“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²并把运动和变化当作从外部强加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指出，任何事物都包含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是包括机械运动在内的一切变化的原因。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每

¹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69页。——译者注

²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75页。——译者注

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¹现实的不同领域有其特殊矛盾，这些特殊矛盾是不同科学的研究对象。为了把握“整体”，我们必须观察每一矛盾的典型特征。矛盾还能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例如，国民党起初是革命的，后来变成了反革命。世界充满矛盾，但一些矛盾比其他矛盾更为重要，因而在任何形势下我们必须认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由主要矛盾而来，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即是其主要矛盾。我们必须懂得如何阐明和解决矛盾。“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²事物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如地主被剥夺就要变为穷人，无地农民则变为地主。战争让位于和平，和平又接着战争。“没有生，死就看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³还必须划清对抗性矛盾（像敌对阶级之间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矛盾（像党的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之间的矛盾）；后者可以经过纠正错误解决，但若不解决也会变成对抗性矛盾。

几年后的1942年，毛对其追随者作了一次关于“艺术与文学”的讲话。主要观点是：文艺是为社会阶级服务的；一切艺术都是由阶级决定的；革命者必须从事为革命事业和人民群众服务的艺术形式；艺术家和作家必须改造自己的思想，便促进人民群众的斗争；艺术不仅必须艺术上完美，也必须在政治上正确。“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艺术家的基本任务。”⁴作家们受到警告，不要被所谓人类之爱引入歧途，因为在分为敌对阶级的社会中没有这个东西：“人类之爱”是有产阶级杜撰的口号。

这就是毛的哲学要点。看得出，它是对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几个套

¹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82页。——译者注

²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0页。——译者注

³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02页。——译者注

⁴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28页。——译者注

话的简单重复。然而，毛的创造性在于他对列宁策略方案的修正。他的创造性和中国共产主义的农民倾向性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原因。“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作为政治口号一直在使用，但在整个革命时期，它不过意味着共产党在组织农民游击队中处于领导地位。毛不仅强调中国与俄国不同，革命要由乡村到城市，而且他还把农民视为天然的革命力量，并且与马克思和列宁相反，他明确表示社会阶层的革命性与其贫穷程度成比例。他所以坚信农民的革命潜力，不仅仅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太弱小，还有原则上的原因。他的口号“农村包围城市”早在1930年就受到当时党的领导人李立三的反。那时，“正统的”革命家们一味服从第三国际的指示，坚持要用俄国的战略，把重点放在大工业中心工人罢工和起义上，农民战争被当作副线。然而，事实证明还是毛的战术有效。后来，毛强调说，虽然斯大林劝阻过，但中国革命还是取得了胜利。苏联在30年代和40年代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物质援助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很可能——这仅仅是猜测，没有确凿的证据——斯大林意识到，如果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他不能期望5亿多人民长期附属于苏联，因而，他很合理地宁愿让中国弱小、分裂，由相互争霸的军事集团统治。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在所有正式声明中表示忠于苏联，于是1949年斯大林没有选择，只得对共产主义的新胜利表示欢欣，并尽力把这个可怕的邻居变为卫星国。

中苏冲突并非出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性和我们可以设想的事实：中国革命与俄国帝国主义的利益相违背。毛于1940年在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论》（*On New Democracy*）的文章中写道，中国革命在“本质上”是基于农民要求的农民革命，这一革命要使农民获得政权，同时，他还强调，为了反抗日本，组织由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下层和爱国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他宣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将在无产阶级即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总之，毛当时的纲领与“第一阶段”的列宁主义相似，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专政。他在1949年6月一次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的讲话中重复了这一点，尽管这时他更加强调“下一阶段”：土地社会化、阶级消亡、“大同世界”随即实现。

共产党胜利后的最初几年似乎是中苏友好的稳定时期，中国领导人对他们的老大哥⁵⁰¹表示谦恭的敬意，虽然像后来人们所知道的，严重摩擦在第一次两国谈判之中已经开始。那时还很难讲存在明确与苏联不同的毛主义学说。正如毛本人曾几次指出的，中国没有组织经济建设的经验，因而照抄了苏联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才逐渐认识道，这些模式在一些重要方面违反了**中国革命中也许已经潜在的但却尚未以明确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

1949年后，中国高速度地逾越了几个发展阶段，每过一阶段就朝向毛主义的具体化迈进进一步。在50年代，这个国家似乎在以高速度重蹈苏联发展的老路。把土地分给农民；在几年内有限地容许私人工业，但到1952年私营工业受到严格控制，1956年就完全国有化了。农业从1955年起实行集体化。开始是合作社，很快进到公有制的“高度发展”形式，尽管允许农民拥有自留地。这一时期中国效仿苏联，给重工业以绝对优先的地位。第一个经济计划（1953年至1957年）打算严格实行中央计划，不惜牺牲农村来大力推动工业化，还引进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几个特征：扩大官僚机构，加大城乡差别，确立高度压抑的劳动法规体系。人们终会看清，在一个小农经济国家不可能实行严格的中央计划。然而，随后进行的行政管理方法的改变尽管不限于各种形式的分散计划，但却在一种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表现：生产指标和现代化是次要的，重点是培养能体现农村生活的真正美德和所设想的具备美德的某种“新人”。

有一段时间，这一发展阶段甚至会显得多少放松了文化专制。这种错觉与党在1956年5月即苏共“二十大”以后，由党发动的并得到毛本人赞同的短命的“百花齐放”⁵⁰²运动相关。艺术家和学者受到鼓励，自由交流思想；一切思想流派和艺术风格都要互相竞争；尤其是自然科学被宣布没有“阶级性”；在其他领域，进步要成为自由讨论的结果。“百花齐放”学说激起了东欧知识分子的热情，他们在自己的国家正经历非斯大林化的骚动。许多人认为，在短时期内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技术最落后的国家已经变成自由文化政策的冠军。但是，这些错觉只持续了几个星期。当中国知识分子受到鼓励，直言不讳地批判现政权时，党立即退回到了压制和恐吓的一贯政策。整个事件的内部历史搞不清楚。从中

国报刊的一些文章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 1957 年 9 月在中央委员会上一次讲话来看,可以认为“百花齐放”的口号是个策略,引诱“反党分子”出洞,这样更容易消灭他们。(邓声称,党允许毒草生长,给群众作为威慑的例子,然后将毒草连根拔起,做中国土地的肥料。)但是,毛也许真的一时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讨论中站住脚。如果这样的话,他的幻想几乎立刻破灭就是无疑的了。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没有实现工业化,这件事很可能造成或者促成了随后十年中政治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变化,全世界看到这些变化都迷惑不解。1958 年初,毛领导下的党宣布“大跃进”,要在随后 5 年中创造生产力的奇迹。工农业生产指标分别增加 5 倍和 1.5 倍,这使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都黯然失色。但是,取得这些异想天开的成就不是依靠苏联的方法,而是依靠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所根据的原则是群众能想到的就一定能做得到,绝不能被资产阶级杜撰的“客观”障碍所阻挡。经济的每一部门都无一例外地要实现巨大增长,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就近在眼前。按照苏联集体农庄组织的农场要由建立在百分之百集体化基础上的公社所取代:取消自留地,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实行公共食堂和集体宿舍。报刊报道说有特殊的居住点:已婚夫妇按固定时间间隔和一定的先后次序去那里居住,以完成生育下一代的爱国义务。“大跃进”的一个著名特征是一大批乡村设立小炼钢高炉。

一段时间内,党的领导人舒适地生活在统计数字的天堂中(正如后来所承认的,统计数字是假的),但很快证明整个计划正如西方经济学家和在中国的苏联顾问所事先预言的那样,彻底失败了。“大跃进”的结果是生活水平灾难性地降低,因为积累率太高;还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城里到处是农村来的打工者,这些人很快证明是多余的,不得不回到混乱和饥馑中的乡村。1959 年到 1962 年是倒退和困难时期,这不仅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还由于连年灾难性的收成和事实上与苏联断绝了经济关系。苏联技术人员突然撤走了,使许多重要工程项目骤然下马。

“大跃进”反映了新的毛主义原则的发展。依靠那种意识形态的政权,农民群众可以为所欲为;不许搞“个人主义”或“经济主义”(即生产的物质刺激);热情可以取代“资

产阶级”的知识和技艺。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时期开始有了更加确定的形式。它由毛在有关会议讲话中加以阐述，在言论中更明白地说明；这些言论只是后来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才泄露出来，其中一部分已由著名汉学家斯图尔特·施拉姆用英文出版。¹

在1959年7月至8月党的庐山会议上，毛作了自我批评的讲话（当然，当时没有发表⁵⁰⁴）。他承认“大跃进”是党的失败，自己没有经济计划观点，没有想到煤和铁自己不能移动，只能由人运输；他对农村的大炼钢铁政策负责，说农村正走向灾难；他现在认识到建设共产主义需要至少一个世纪。然而，“大跃进”并非彻底失败了，因为领导人从错误中学到了东西。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即使马克思也一样；而且在这种事情上不仅仅是经济在起作用。

1960年公开化的中苏争端首先是由于苏联的帝国主义政策，而不是两国间的分歧造成的，尽管两国在共产主义理想和方法上确实存在着分歧。中国人对斯大林表示忠诚上是热烈的，但并不想接受东欧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的状况。争端的直接原因是核武器。俄国人答应给中国人核武器，但条件是这些武器的使用必须由他们控制；其他争端则无需在这里一一列举，包括苏联的对美政策以及“和平共处”理论等。这场冲突是两个帝国之间，不仅是两种共产主义之间的冲突，其程度可用一件事说明。1956年中国毫无保留地支持苏联入侵匈牙利，但在两国关系已经断裂的12年后，却强烈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尽管在毛主义者看来，杜布切克的政策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布拉格之春”及其自由化思想明显地比苏联制度更为“资产阶级化”。后来，当中国国内两派之间的争吵使国家走向内战边缘时，很清楚两派都同样在根本意义上反对苏联，即从中国的利益和主权来考虑。

可是，在与莫斯科冲突的第一阶段，中国人表示重视意识形态的分歧，并希望通过建立新的理论模式取代俄国人而成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领袖，或者至少以牺牲莫斯科为代价⁵⁰⁵取得相当数量同伙的支持。后来，他们似乎决定通过直接抨击苏联帝国主义，而不是敦促世

¹ 施拉姆编辑：《未公开的毛泽东语录》（*Mao Tse-tung Unrehearsed*），1974年版。

界学习中国的榜样，从而能获得更好的结果。“意识形态论战”，即中苏领导人之间公开的你来我往的谩骂，从1960年一直持续，其激烈程度随国际形势而变化，但显然已变为两个敌对的帝国之间为争夺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而发生的冲突。双方都打着与这个或那个民主制国家保持特殊(ad hoc)同盟关系的牌。改编过了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石，所发生的方式与以前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帝国主义一样。两个强大的帝国就这样互相对峙，各自声称自己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仇视对方超过仇视“西方帝国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已发展到如此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人抨击美国政府，主要是因为它反苏不够坚决。

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斗争从1958年起在秘密地继续着，主要争论在那些支持苏联式的共产主义的人和那些赞成毛阐述的新的完美社会的人之间进行。但是，前者不“亲苏”，也并非要中国听从莫斯科的旨意。争论的具体问题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保守派”和“激进派”对军队有不同的看法。前者要求军队在训练和先进技术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后者则坚持游击战的传统。这是1959年第一次清洗的原因，受害者中有军队首领彭德怀。

第二，“保守派”相信或多或少是苏联模式的工资差别和物质刺激的作用，强调城市和大型重工业工厂的作用；而“激进派”则宣扬平均主义，依赖群众的热情来发展工农业。

第三，“保守派”推崇教育体制中各个层次的技术专业化，以便培养最终能与发达国家相竞争的医生和工程师；而“激进派”则强调意识形态的灌输，相信这种灌输若做得成功，技术技艺自然而然会有。⁵⁰⁶

“保守派”很清醒，愿意从俄国人那里或从欧洲和美国那里寻求科学知识和技术；而“激进派”则争辩说，科学和技术问题可以通过读毛泽东的警句箴言获得解决。

“保守派”基本上是苏联式的党的官僚，他们关中国的技术、军事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推崇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由党的机器实行严格的等级控制；“激进派”似乎很相信共产主义千年天国即将到来的乌托邦幻想，相信意识形态万能，推崇“群众”直接专政（但要

在党的领导下），而不通过专门的镇压机器。至于两派的基地，“保守派”明显地集中在北京，“激进派”集中于上海。

两派都理所当然地求助于毛的意识形态权威，他从1949年起就是不可动摇的。与之相同，苏联20年代的所有派别都援引列宁的权威。不同的是，在中国，革命之父还健在，他不仅支持“激进派”，而且事实上是他创立了“激进派”，所以，“激进派”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比其对手好过。

但是，“激进派”并非在所有方面都占上风。由于1959年至1962年倒退的结果，毛不得不应付党的领导人中间的强烈反对，他的权力似乎受到了明显的限制。有些人确信自1964年起毛没掌握实权。但是，中国的政治有其隐秘性，所有这类估计都不可靠。

“保守派”的主要人物是刘少奇，他于1958年底在毛之后接任国家主席，在1965年至1966年的“文化革命”¹中受到指责，被咒骂为资本主义的大恶魔。他写过一本论共产党人修养的书，这本书连同他的另外两个小册子自1939年起就是党的主要读物。25年后，这部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学说作了完美无缺的阐释的书突然成了儒家学说和资本主义的一口毒井。根据许多批判者的说法，孔子的坏影响主要有两点：刘强调了共产主义自我完善的理想，没有强调无情的阶级斗争；刘把共产主义描绘成和谐统一的未来，而按照毛的教导，斗争和冲突才是自然的永恒规律。

因而，1965年底，党内发生的几乎把中国引入内战的夺权斗争不仅是敌对派系之间而且是两种共产主义之间的斗争。人们普遍认为“文化革命”是由毛授意写作、于1965年11月发表在上海的一篇文章开始的。文章指责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了一部戏剧，打着历史寓言的幌子攻击毛解除彭德怀国防部长的职务。这就发动了反对文化、艺术、教育领域中“资产阶级”影响的运动，号召进行“文化革命”以恢复国家的革命纯洁性，防止复辟资本主义。“保守派”当然附和了这个目标，但试图对之加以解释，以便不扰乱已建立起来的秩序和他们自己的地位。但是，“激进派”设法解除了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的职务，

¹ 时间有误。——译者注

并控制了主要报纸。

1966年春，毛和他的“激进”伙伴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地方——大学——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鼓励学生起来反对那些以资产阶级知识为据点反对毛主义的教育的“反动学术权威”。要指出的是，毛早就宣称学校应一半时间学习，一半时间从事生产劳动；聘任教师、录取学生要取决于意识形态上的素质或“与群众的联系”，而不取决于学习成绩；共产主义宣传是最重要的课程。中央委员会号召清除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⁵⁰⁸。由于官员们对毛的观点口头上说执行而实际上阻挠，毛便采取了在他之前任何共产党领导人没有敢冒险过的步骤，毛要求大批没有组织的青年摧毁他的对手。大学和学校开始组织革命突击队——红卫兵队伍，要把权力归“群众”，把堕落的党和国家官员扫到一边。群众集会、游行、街垒巷战成了所有大城市生活的特点（大部分农村不这样）。毛的支持者们熟练地利用了由“大跃进”造成的不满和失败，把这些归罪于官员，指责他们造成经济失误，想要复辟资本主义。几年内，学校和大学完全没有教学，因为毛主义派别向学生们保证，他们出身好又忠于领袖，拥有“资产阶级”学者所不知道的伟大真理。受到这样的鼓励，成群的青年人侮辱、打骂教授，学识便是教授们的唯一罪名，抄家以寻找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证据，把历史文献当作“封建主义遗物”捣毁。书籍被大规模地焚烧，当局却已谨慎地关闭了各个博物馆。战斗口号是平等、人民有权、肃清“新阶级”的特权。数月后，毛主义者又把宣传矛头指向工人。事实证明，这个靶子比前边的难打，因为工人阶级中高工资的和更稳定的部分不急于为工资平等战斗或为共产主义理想作出更多的牺牲。但是，一些较穷的工人被动员起来搞“文化革命”。运动的结果便是社会混乱、生产崩溃；红卫兵和工人中的不同派系很快开始以“真正的”毛主义的名义互相武斗，发生了许多激烈的冲突，军队只得干预以恢复秩序。

毛本人是不竭的智慧源泉，他处在一切批评之上，所有对手们不能直接抨击他。若不是这样，那么很明显，他是不会采取如此危险的步骤，即让非党力量摧毁党的组织。像他之前的斯大林一样，毛本人就是党的象征，因而能够以党的利益的名义捣毁党的官僚体制。

由于这个原因，无疑在文化革命期间已经极度膨胀的对毛的个人崇拜发展到荒诞而又可怕的地步，甚至超过了死于毛之前若干年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尽管这也许看起来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领域毛不是最高权威的：病人读了他的文章能除病祛痛，外科医生作手术要求助于“小红书”，群众集会要集中背诵人类有史以来创造的最伟大天才的教导。赞颂奉承达到这种地步，苏联报刊只要把中国报纸美化毛的版面摘下重印，不加评论就能使读者发笑。毛最忠实的助手、指定的接班人、军队首领林彪（但他不久被“证明”是叛徒、资本主义代理人）规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用材料的百分之九十九必须取自毛这位领袖的著作。换言之，除非有其他渠道，中国人甚至连马克思主义都学不到。

狂热歌颂的目的自然是防止批评者在任何时候削弱毛的权力和威望。在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¹毛说赫鲁晓夫下台很可能“因为他根本没有个人崇拜”。后来在林彪失宠和死亡之后，毛试图把个人崇拜归罪于林彪。然而，1969年4月，在标志着文化革命结束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毛的领袖地位和林彪作为他的接班人的地位都正式写入了党章，这在共产主义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毛主席语录》（*Quotations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这本“小红书”也在这时开始涌现。起初，它是为军队使用的，很快，林彪撰写前言的这本“小红书”成了通用读物和中国人民的基本精神食粮。它是通俗问答集，包括公民应懂得的有关党、群众、军队、社会主义、帝国主义、阶级等等一切方面，还有大量道德的和实践的教导；它规定人应该勇敢、谦虚、不应被困难吓倒；军官不应殴打士兵，士兵不应拿东西不付钱等等。下面是教导的一部分。“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帝国主义者的寿命不会长了，因为他们尽做坏事。”“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是一切军事原则的根据。”“……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钢琴有人弹得

¹ 斯诺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有所记述，1973年版，第70页，第205页。

好，有人弹得不好，这两种人弹出来的调子差别很大。”“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¹

文化革命的动乱一直持续到1969年，有段时间局势明显失控。红卫兵队伍中出现各种派别、组织，对毛的语录各派都认为自己的解释正确。文化革命的主要理论家之一——陈伯达，经常援引巴黎公社的例子。唯一的稳定因素是军队，毛很谨慎，不鼓励军队搞大规模讨论或抨击军队官僚化的领导人。当地方上的冲突过于激烈时，军队就出面恢复秩序。511
引人注意的是，省级指挥官不太热心支持革命者。由于党的机器已在很大程度上崩溃，军队的作用自然有很大的增长。在从政治上肃清并解除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几个重要人物的职务后，毛用军队限制极端革命分子，他们中许多人被以接受再教育为名遣送到农场劳动。斗争的结果，改组后的党的领导层在大多数观察家看来是个折中方案，哪一派都没有取得明显的胜利。只是在毛逝世后，“激进派”才被击败。

我们已经看到，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在1955年到1970年这些年间有所发展，形成一种新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这在几个重要方面与苏联的不同。

不断革命的理论是毛的思想基础，正如他于1958年1月（施拉姆，第94页）所宣称的。1967年，当文化革命正在进行时，他说这只是一系列不定期革命中的第一次，不要以为经过两次、三次或四次文化革命就一切都好了。毛似乎相信，稳定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特权和“新阶级”的出现，因此就要过一段时期打击一次，让革命群众砸烂官僚体制的根源。因而，好像永远不会有不存在阶级或冲突的社会秩序。毛经常重复“矛盾”是永存的，必须不停地予以解决。他对苏联修正主义者的指责之一就是他们不谈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矛盾。刘少奇的错误之一也是相信未来社会是和谐统一的。

¹ 以上分别参见《毛主席语录》第65、70、73、83、85、97、98、99、101、171、189、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译者注

毛不相信共产主义社会的秩序是和谐的，这显然不符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乌托邦。而且，他在对遥远未来的预言中走得更远：由于万物变化并最终消失，共产主义不是永恒的，人类本身也会消亡。“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也必定改变，也有开始和结束……世上万物都有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猴子就成了人，人出现；最终，整个人类将消亡，也许会变为别的东西。地球本身也将停止存在。”¹ “我512不信只有人才有双手，将来动物不发展了？只有一种猴子才能进化？马、牛、羊、鸡、犬、猪就不能进化了？地球原来是死的，后来氢和氧结合才有水。”²

同样，毛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未来并没有保证。未来的一代也许会选择复辟资本主义，但如果这样做，他们的后代还会推翻资本主义的。

在本质上违背了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是尊崇农民为共产主义的中坚。而对欧洲共产党人来说，农民只是革命斗争的辅助力量，在其他方面则受到鄙视。在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宣称，人民军队占领城市是“好事”，因为否则的话，蒋介石会继续把持城市；但又是“坏事”，因为这导致了党内的腐化。

对农民和乡村生活的崇尚能解释毛主义大部分典型的特征，包括对体力劳动本身的尊崇。马克思主义传统把体力劳动当作必要的邪恶，认为通过技术进步，人类将逐步从中解脱出来；但对毛来说，体力劳动本身是高尚的，有不可取代的教育价值。学生花一半时间参加体力劳动的观点并非出于经济需要，更多的是为了磨炼意志。“通过劳动受教育”具有普遍的价值，与毛主义的平等主义理想密切相关。马克思相信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最终会消失，他认为不应当一些人只动脑力，另一些人只动体力。马克思所说的“全面的人”这种理想的中国说法是必须让知识分子去伐树、挖沟，大学教师要从目不识丁的工人中去得到补充，因为，毛说过，即使大字不识的农民也比知识分子能更好地理解经济问题。

¹ 施拉姆编辑：《未公开的毛泽东语录》，1974年版，第110页。

² 施拉姆编辑：《未公开的毛泽东语录》，1974年版，第220-221页。

然而，毛的理论走得还要远。不仅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流放到乡下劳动，或到专门机构（即集中营）接受劳动教育，而且必须认识到知识性的工作容易导致道德堕落，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人们读书太多。这种思想以各种形式出现在毛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总之，他好像认为人们懂得越多就越坏。1958年3月，在成都的一次会议上，他说，历史上没有多少知识的年轻人总是胜过博学的人。孔子、耶稣、如来佛、马克思和孙中山开始形成其观点时都很年轻，懂得也不多，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学，富兰克林在街上卖过报纸，青霉素的发明者曾在洗衣店干过活。按照毛1959年的一次讲话，梁武帝统治时的宰相陈庆之不识字，却能赋诗；可是，毛也说他本人不反对扫除文盲。在1964年2月的另一次讲话中，他回忆说，明朝只有两个好皇帝，都不识字，而知识分子当政后，明朝就灭亡了。“书读多了……是书呆子了。”¹“书不能读得太多。马克思主义的书不能读得太多，读十来本就行了。读书太多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修正主义。”²“梁朝的皇帝早年治国很有方略，后来念了许多书，再也治理不好国家了，他饿死在太仓。”³

回忆历史的寓意是显而易见的：必须把知识分子遣送到乡村去劳动；学校和大学的学时必须缩短（毛数次说过各级学校的学时太长），招生中政治标准第一。最后一点曾经在党内引起激烈争论，现在也一样。“保守派”争辩说，在招生和授予学位中至少要有最低的学术标准；“激进派”却坚持除了出身和政治觉悟外别无标准。后一观点明显地符合毛的观点。他在1958年两次自豪地说中国是一张白纸，可以为所欲为地绘画。

这种对于学问、专业化和特权阶级创造的整个文化的深切怀疑，明确地说明了中国共产主义的农民起源。这距离马克思的学说和欧洲包括列宁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不能再远了。虽然俄国革命开始时也有过类似的仇恨教育的表现，尤其在无产阶级文化派运动中。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优秀分子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鸿沟在以前比俄国的还要深，大老粗当然高于学者的观点看来纯粹是自下而上的革命的自然结果。然而，在俄国，仇恨教

¹ 施拉姆编辑：《未公开的毛泽东语录》，1974年版，第204页。

² 施拉姆编辑：《未公开的毛泽东语录》，1974年版，第210页。

³ 施拉姆编辑：《未公开的毛泽东语录》，1974年版，第211页。

育和专业化从来就不是党纲的特征。当然，党消灭了旧知识分子，竭力把人文学科研究、艺术和文学变为党自身的宣传工具；但与此同时又宣布尊重专业知识，发展在高度专业化基础上形成的教育体系。如果国家意识形态赞扬无知，警告人们不要多读书，那么俄国的技术、军事和经济现代化就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毛似乎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不会也不可能以苏联方式实现现代化。他经常告诫人们不要“盲目地”模仿其他国家。“我们[过去]……什么都是照抄外国，硬搬外国，结果是一个大失败，使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把中国革命的胜利推迟了许多年”。（施拉姆，第87页）。在另一场合，他讲到，照搬苏联模式会带来严重后果：他本人曾有三年不能吃鸡蛋、喝鸡汤，就因为某个苏联杂志说这些东西对身体有害。

因此，毛主义就不仅表达了农民对精英文化传统的憎恨（例如，类似特征可在历史上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看到），还表达了中国人传统的排外情绪，以及对来自外国和白人的每一事物的不信任，而白人一般代表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只能加强中国人这种普遍的态度。

出于同一原因，中国人寻找新的工业化道路则以“大跃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其意识形态并没有被放弃。毛及其追随者相信，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上层建筑”即创造“⁵¹⁵新人”开始；就积累率来说，意识形态和政治是第一位的；社会主义不是技术进步和战争的问题，而是制度和人际关系的集体化。由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理想的共产主义制度在技术处于原始状态时也能建立。但是，要做到此，必须铲除一切旧的社会关系和产生不平等的条件。因此，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捣毁家庭联系（家庭联系对国有化的阻力尤其大），并开展反对自私自利和物质刺激（“经济主义”）的运动。当然，奖励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根据技术和工种有差别的，但比起苏联，差别似乎就小多了。毛认为，如果教育人民得当，人民不用专门诱导就会努力工作；“个人主义”和满足个人的欲望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毒害颇大，必须根除。毛主义是典型的、极权主义的乌托邦，任何事情都要从属于“为全体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个人谋利益。尽管这没有说清楚，除了通过后者如何才能定义

前者。毛的哲学不用“个人利益”这个概念（在苏联意识形态中这个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也避免用任何形式的人道主义语言。毛明确谴责“天赋人权”这种观念，¹因为社会是由敌对的阶级构成，敌对阶级之间不可能有同一性和互相理解，也没有任何独立于阶级的文化形式。“小红书”告诉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²这样的话，可能欧洲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人会写。必须与过去、与传统文化、与任何可以填补阶级间鸿沟的东西进行彻底的决裂。

根据这位领袖的一再重复的说法，毛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具体情况。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更准确的描述应为：毛主义就是运用列宁的夺权技巧、⁵¹⁶用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作掩护来达到不符合或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目的。“实践第一”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但由此推理说读书有害，文盲自然比有文化的人更聪明却实在不好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辩解。用农民取代无产阶级的最革命阶级地位公然违背了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不断革命”这种思想也是如此，它认为阶级冲突注定不断发生，必须通过定期的革命予以解决。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把体力劳动尊为人类最崇高的职业则是对马克思主义乌托邦的可笑的解释。把农民当作没有被分工损害的“全面的人”的最高尚代表，这个观点在俄国19世纪的民粹主义那里也有过，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普遍的平等原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很难设想马克思会认为这条原则应该表现在打发知识分子下稻田的政策中。举个不对应于年代的比喻，根据马克思学说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把毛主义当作原始共产主义一类的理论。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原始共产主义不但还没有克服私有制，甚至尚未达到私有制阶段。

在某种有限的意义上，中国共产主义比苏联共产主义更讲平均主义，但这不是因为不像苏联那么极权化，而是因为极权得更厉害。就工资差别较小而言，它是更平等化了；等

¹ 施拉姆编辑：《未公开的毛泽东语录》，1974年版，第235页。

² 参见《毛主席语录》，第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9年。——译者注

级的一些象征，诸如军衔制，早已取消；总之，中国政体比苏联的更加“民粹”。为了控制人民，当地或地方组织机构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职业警察的作用相应减弱。普遍监视和互相揭发的制度似乎通过各种地方委员会发挥作用，并公开称为公民的义务。确实，一方面，毛享有比任何布尔什维克更为广泛的支持，因而比他们更相信自己的力量：这不仅表现在他多次命令让人民有话就说（因为斯大林偶尔也用这个方法），更表现在文化革命中他冒险煽动青年人起来推翻党的现存机器。然而，另一方面，很清楚，在整个动乱时期，他手中掌握了权力和强制工具，这使他能够遏制那些执行他的教导过火的人。毛在许多场合宣扬“民主集中制”原则，我们不清楚他的解释与列宁的有什么不同。无产阶级通过党统治国家，党的作用建立在纪律的基础上，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当毛说，集中“首先要集中正确的意见”¹时，不用说，一个观点正确与否就看党怎样决定了。

1957年2月，毛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On the Correct Handling of Contradiction among the People*）的讲话，这是另一篇为他赢得理论家声誉的主要著作。他说，我们必须认真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后者通过专政来解决，前者则通过民主集中制来解决。在“人民”中，自由和民主占主导地位，“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围。这就是说，⁵¹⁸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²实际上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是人民内部矛盾必须由熟练地结合教育和行政手段来解决，而敌我矛盾只能通过实行专政来解决。但是，正如毛在别处所说的，在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中，如果主张不正确观点的人拒绝承认错误，矛盾最终会转化为对抗性的。这几乎只能理解为毛对党内反对派的警告：要是及早承认真理，会得到宽恕，否则会被宣布为阶级敌人并加以对待。关于人民内部矛

¹ 施拉姆编辑：《未公开的毛泽东语录》，1974年版，第163页。

²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367-368页。——译者注

盾冲突的观点，毛列举了六条区别正确与错误的标准：团结而不是分裂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利而不是无利、有助于巩固而不是削弱人民民主专政、有助于加强民主集中制、有助于维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有利于国际社会主义团结和世界热爱和平的民族的团结，这样的观点和行为都是正确的。

所有这些有关民主、自由、集中制和党的领导作用的教导都没有违反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正统观念，然而实践中好像就有所不同了。中国并不像许多热衷毛主义的西方人士所想象的那样，由“群众”统治，而是政府有更浓厚的协商气氛，因为党比起苏联领导人掌握着更多的意识形态操纵方法。这是由于革命之父长期健在，他的权威牢不可破，还由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村社会。这可谓证实了马克思的说法，农民的领袖还必须是农民的君主。在代表旧文化的各阶级实际已被消灭和信息渠道甚至比苏联控制得还严（如毛所说，“集中正确的思想”）的形势下，许多地方性政治或生产问题能够由地方委员会而不是由官方政府机构来解决，而不至于侵犯中央政府的权力。

“平等主义”当然是毛主义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特征之一。我们已经看到，它的基础是倾向取消工资差别和人人必须参加一定量的体力劳动的原则（尽管领导人和主要理论家似乎不在这个要求之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政治意义上的平等趋势。在现代，获得信息是一个基本资产和真正参与政治的**必要条件**（Sine Quanon），在这方面，中国人民比苏联人民所受的剥夺更加严重。中国的一切都是秘密的。实际上，不公布任何统计数字，中央委员会和国家行政机构会议经常在绝密状态下进行。认为“群众”控制经济是西方毛主义者最过分的幻想之一，而实际上这些群众处在一个除了最高层以外，任何人甚至都不知道经济计划的国家。公民从官方渠道得到关于外国的消息微乎其微，文化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埃德加·斯诺，这位对中国共产主义最热心的观察家之一，1970年访华后的报道说：公众能买到的唯一书籍是教科书和毛的著作；中国公民集体去剧院（事实上就不售零票）；他们也可以读报，但报纸对外部世界只字不提。另一方面，正如斯诺所说，中国人也免去了凶杀、吸毒、性变态的困扰，而西方读者整天看到这些东西。

宗教生活实际上已被肃清，官方禁止出售宗教崇拜用品。中国取消许多苏联仍保留的民主外表，象普选、独立于警察当局的检查部门。后者事实上既执行“正义”，也施行镇压，直接镇压的程度不得而知；集中营关押的人数甚至没有人能作出大概的估计。（苏联这类事情就公开得多，这是斯大林死后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政策的结果。）专家争论不一的难点可以用一件事说明：对中国人口的各种估计上下竟相差4000万到5000万。

毛主义在中国以外的意识形态影响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与苏联关系破裂后，中国没有把世界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而是分为富国和穷国。苏联属于前者，而且根据毛的看法，是资产阶级复辟。林彪试图在世界范围应用中国红军“农村包围城市”的旧口号。中国的例子当然对第三世界国家有一定的影响力。这种共产主义的成就是明显的：从外国势力下解放了中国，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使中国走上技术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的道路。整个社会生活的国家化像在其他极权国家一样，解除或减轻了困扰人类尤其是落后农业国的主要疾患：失业、局部饥荒和大量的乞丐。至于中国模式能否成功地仿效，比如在黑非洲一些国家，这个问题超出了本书的范围。

毛主义意识形态影响的另一个方面，特别在60年代，使西方一些知识分子和学生接受构成中国共产主义门面的乌托邦幻想。那时，毛主义试图把自己表现为解决人类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各种左派组织和个人好像正儿八经地相信毛主义是治愈工业社会各种病症的完美疗法，相信美国和西欧应该根据毛主义原则进行革命。在苏俄的意识形态声望扫地后，空想的热望便集中在遥远的东方，使这更加容易的是因为人们普遍对中国的事情一无所知。对那些寻求完美世界和一切崇高的、无所不包的革命的人来说，中国成了一个新制度的麦加圣地和革命战争的最后伟大期望——因为中国不是已经拒绝了苏联的“和平共处”公式吗？当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放弃革命的信仰进而转到更“正常”的政治竞争时，许多毛主义组织悲观失望，明显地不再希望毛主义能够在欧洲或北美成为一股真正的力量。确实如此，西方国家现存的毛主义共产党的地位没有重大影响，也没形成有影响的派别，仍然是四分五裂的小组织的样子；在东欧也没有取得值得注意的成功，只有阿尔巴尼亚的情况特殊，

不包括在内。于是，中国人改变了策略。他们不把毛主义当做对英国、美国、波兰、刚果有同等价值的特效药推荐，而是集中力量揭露俄帝国主义的嘴脸，并在阻止苏联扩张这个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求盟友，或者无论怎样都要赢得一定的影响。这的确好像是一条希望大得多的路线，尽管是一条率直的政治路线，而不是毛主义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执行这项政策中仍然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只是装璜，不是实质。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角度来看，毛主义意识形态值得注意并非因为毛“发展”了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它说明，任何学说一旦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就会具有无限的伸缩性（flexibility）。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了俄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想通过其他途径而不是一般的市场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落后国家事实上不可能在市场中占有便宜）来奋力克服其技术和经济落后状况的大国的意识形态粘合剂或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军事化国家的动力，这一国家使用武力和意识形态激励来动员其人民加入现代化事业。诚然像我们看到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些重要成分则被用于为建立极权政府提供辩护。但是，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为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所构思的理想，而不是组织农民建立工业化雏型的方法。然而，事实上这个目标通过一种意识形态也能达到。在这种意识形态里，马克思主义的遗迹与农民乌托邦和东方专制主义传统混杂在一起。这个混合物把自己描绘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实行起来有一定的成效。

西方羡慕中国共产主义的人士所具有的困惑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知识分子找不到足够激烈的字眼来谴责美国穷兵黩武，便对这样一个社会心醉神迷：儿童从3岁开始军事训练，所有男性公民被迫服兵役4至5年。嬉皮士迷恋如此一个国家，即强制实行严格的劳动纪律，没有假日，还鼓励清教徒式的性道德，更不用说吸毒了。甚至一些信奉基督教的作家也对这个制度大加赞扬，尽管宗教在中国已被无情地根绝。毛好像相信来世，这也无关紧要。1965年，他曾两次对埃德加·斯诺说，他“很快就要见上帝去了”；在1966年的一

次讲话中他说了相同的话；¹ 1959年也说过，² 当时他幽默地谈到将来要见马克思。

很明显，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当代世界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因素，这不仅仅是从牵制苏联扩张主义的角度来看的。然而，这个问题与马克思主义历史没有什么关系。■

【文摘】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跋

(波兰)科拉科夫斯基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世纪最大的幻想(fantasy)。它是一个提供了关于完美统一社会的远景的梦，这种社会使人类一切愿望都会满足，一切价值都会实现。马克思主义继承了黑格尔关于“进步的矛盾”的理论，但也接受了自由进化论观点，即历史进程“归根结底”必将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人类越能掌握自然界，过一段时间就能获得更多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成功主要归于把救世主的幻想与一项具体的实在的社会事业——欧洲工人阶级反对贫困和剥削的斗争相结合。这种结合表现为一种条理清楚的学说，其名称(由蒲鲁东而来)却是很荒唐的——“科学社会主义”。说它荒唐是因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可以是科学的，但目的本身的选择却不然。然而，这个名称不只反映了马克思及其同时代人共有的对科学的崇拜，它表现了一种信念(本书已不止一次进行批判性讨论)：在意志的指导下，人的知识和人的实践最终必然结合起来，成为不可分离的完美的统一体；所以，目的的选择必将与达到目的的认识手段和实践手段相同一。这种混淆的自然结果就是认为，某一特定社会运动的成功就能证明该运动在科学意义上是“正确的”，或者说，不管谁，只要他证明比别人强大，就一定是“科学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作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殊伪装下的一种完全反科学、反理智的特征。

¹ 施拉姆编辑：《未公开的毛泽东语录》，1974年版，第270页。

² 施拉姆编辑：《未公开的毛泽东语录》，1974年版，第154页。

说马克思主义是幻想并不意味着它一无所是。马克思主义对过去历史的阐释必须与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为我们的精神财富增加了价值，丰富了对过去的理解。确实，有人说过，这个学说在严格的形式上是无意义的，而在松散的形式上是老生常谈；但是，如果它已经成为老生常谈，那大半是要归于马克思的独创性。而且，如果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对过去年代的经济学和文明有了更好的理解的话，这无疑与马克思时常以极端的、独断的、不可接受的形式阐述其理论有关。要是他的观点当初囿于理性思维惯有的一切限制和保留，那它们就不会有像现在这样的影响，也许根本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事实上，正像人文理论经常发生的那样，荒唐成分能有效地传播其合理的内容。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作用可以与社会科学中的精神分析学说的作用或行为主义的作用相比。弗洛伊德和华生以极端的形式表达了各自的理论，从而成功地在真实的问题上引起广泛注意，开辟出有价值的探索领域。如果他们修饰自己的观点，小心翼翼的有所保留，就会失去明确的要点和论辩的说服力，很可能就做不到现在这样。研究文明的社会学方法在马克思之前的著作家已详细说明，像维科、赫尔德、孟德斯鸠或与马克思无关的他的同时代人米什莱、勒南和丹纳，但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以极端、片面、独断的形式表述其观点，而马克思的长处正是由这些特点构成的。

结果，马克思的精神遗产与弗洛伊德的精神遗产经历了几乎完全相同的命运。正统观念的信奉者依然存在，但作为一股文化势力可以忽略，而马克思主义对人文知识尤其是历史科学的贡献已经成为普遍的基础论题，已不再与任何意欲解释一切事物的“体系”相联系。例如，如今人们如果依据特定时期的社会冲突的观点来研究文学史和绘画史，就不会因此而把自己当做或被别人当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人们可以不相信整个人类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或文明的不同方面没有各自的历史，因为“真正的”历史就是技术和“生产关系”的历史，因为“上层建筑”起源于“基础”等等，但依然能够进行研究。

在一定范围内，承认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不等于认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这样说除了其他原因外，还因为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有一条根本原则：只有根据未来解释过去，

才能把握历史过程的意义。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对未来有所理解时，我们才能理解过去和现在。几乎令人不可置疑的是，若失去其所称的关于未来的“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这样的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预言当然不仅是许多科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甚至最琐碎的事情中不可或缺的，虽然我们不可能像认识过去那样“认识”未来，因为所有的预言都有不确定性。“未来”也许转眼间即到，也许是百万年以后的事；预言的困难程度当然随距离和对象的复杂程度而增加。我们知道，关于社会问题的预言尤其靠不住，哪怕是有关短期、某项可数量化的因素，如人口预测。总之，我们通过对目前种种倾向的推断来预言未来，而又意识到这种推断的价值不论何时何地都是非常有限的，所探索的任何领域的发展曲线都不会无限地按同一方程式延伸下去。至于全球规模的和没有时间限制的预测，无论提供的前景是好是坏，都不过是一些空想。没有合理的方法来预言很长时期之后“人类的未来”，或者预卜将来若干世纪“社会形态”的本质。我们可以进行这种“科学”预言，不这样做我们甚至就不可能理解过去，这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中固有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种理论是幻想和为什么在政治上颇具效力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已取得的影响几乎都来自其预言、幻想和非理性成分，远不是其科学性的结果或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盲目相信人人满意的天国就在眼前待着我们的学说。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预言几乎全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但这也不能在精神上扰乱笃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就像不能扰乱信奉千禧年之教义的人一样¹，因为这种信念并不基于任何经验的事实根据或设想的“历史规律”，仅仅出于对信念的心理需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起着宗教的作用，其效力具有宗教的性质。但是，它是一种伪造的宗教，是对宗教的滑稽可笑的模仿，因为它把其世俗的末世学²表现为一种科学体系，而宗教神话却不这样做。

我们已经讨论了马克思主义与其在共产主义中的具体体现即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

¹ 基督教的说法，耶稣将于世界末日到来之前，重新回到世界为王一千年。——译者注

² 末世学是研究人类和世界终向的神学。——译者注

态和实践。所以，再坚持说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共产主义的有效动因的话，就很荒唐了；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不只是马克思主义的“堕落”，也是对之可能的阐释，甚至是有根据的阐释，尽管在某些方面的阐释还很幼稚而又不全面。马克思主义是某些价值的结合，这些价值虽然与逻辑理性不相矛盾，却证明与经验理性不相容，所以实现其中一些价值就要牺牲另一些价值。然而，正是马克思宣称，全部共产主义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公式：消灭私有制，未来的国家必须接管对生产资料的集中管理，消灭资本意味着消灭雇佣劳动。由此推论，剥夺资产阶级、实行工农业国有化会带来全人类的解放，这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合逻辑之处。最后，事实是，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化后，在此基础上就可能构筑谎话、剥削和压迫的高楼大厦。这本身并非马克思主义的结果，相反，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混杂的特殊形式，它起源于许多历史环境和偶然事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不能说马克思主义在本质意义上有任何被“误解”的地方。现今人们引用来说明“那不是马克思的本意”的论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苍白无力的。马克思的意图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评价中并不是决定因素。如果人们仔细观察，那么马克思对自由、民主并非像初看上去那样仇视，并且还有比这个事实更重要的赞同自由价值和民主价值的论述。

马克思继承了浪漫主义关于社会统一的理想，共产主义以工业社会中唯一可能的方式实现了这个理想，即通过政府的专制制度。这个梦想的起源可以在18世纪由温克尔曼和其他人普及了的、后来又被德国哲学家捡起的对于希腊城邦国家理想化了的想象中找到。马克思似乎想象，一旦消灭了资本家，全世界就能变成雅典的大会场（agora）似的：只要禁止私人占有机器和土地，人们就像着了魔法一样不再自私，人们的利益将达到极其和谐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没有解释这项预言是如何建立的，或者有什么理由认为，生产资料一旦国有化人们的利益就不会再发生冲突。

而且，马克思把他的浪漫主义梦想与社会主义的期望相结合，即一切需要都会在尘世的天国里得到完全满足。早期社会主义者似乎已经在有限的意义上懂得“各取所需”的口号：他们指人们不应该挨冻受饿，或把生命耗费在躲避贫困上。但是，马克思以及其后的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想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匮乏都会结束。这很可能是抱着过分乐观的希望，即希望一切需要都会满足，好像人人都有魔圈或俯首贴耳的神灵。但是，既然这几乎不能当真，那么考虑这个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著作中找到相当程度的证实，认定共产主义会保证满足“正当的”或“真正的”符合人类本性的需要，但不是各种奇想和欲望。然而，这就引出一个没有人能够回答的问题：由谁来决定哪些是“真正的”需要？标准是什么？如果每个人为自己评判，那么，只要需要是实际上主观感觉到的就是真正的需要，没有任何区别的余地。另一方面，如果由国家来决定需要，那么，历史上最伟大的解放就在于普遍配给制。

现在，除了一小撮新左派青年，人们都很清楚社会主义不能真正“满足一切需要”，而只能以公正地分配不充裕的资源为目标。这留给我们一个问题：如何定义“公正地”，又如何决定在每一情况下通过哪些机制达到这个目标。完全平等的概念，即所有产品人均一份，不仅在经济上实行不了，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完全平等只有在极端专制主义的制度下才能想象，而专制本身又以不平等为前提，至少在参与权力和获得信息这些基本方面有优先权。[出于相同的原因，当代左派分子（gauchists）要求更多的平等、更少的统治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生活中，更多的平等意味着更多的统治，绝对平等意味着绝对统治。]

如果社会主义要强于极权监狱的话，也只能是一种在互相限制的不同价值之间作出妥协的制度。经济计划囊括一切即使能实行——人们几乎一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也不能与小生产者和地区单位的自治相容。这种自治虽不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传统价值。技术进步不可能与每个人生活条件的绝对保障共存；自由与平等、计划与小群体自治、经济民主与有效管理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且这些冲突只能通过妥协和部分地解决而得以缓和。

在发达工业国家，为消除不平等和保证最低限度的安全感，以极度扩大国家科层体制¹

¹ 此处作者所用的是“bureaucracy”一词，原意为“官僚”、“官僚政治”等，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用此词指包括社会

(bureaucracy)为代价,创建、发展了各种社会制度(累进税制、公共医疗事业、失业救济、物价控制等等)。谁也提不出建议,怎样才能避免付出如此的代价。

类似的问题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关系,马克思的学说对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提供不了帮助。对历史的终极目标、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和“社会形态”自然更替的启示录式的信念;⁵²⁹“无产阶级专政”、提倡暴力、相信工业国有化的自动效力,以及关于没有冲突的社会和不用货币的经济的空想——所有这一切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观念毫无共同之处。后者的目的是创立一些制度来逐渐削弱生产受利润支配的状况,消灭贫穷,缩小不平等,清除教育机会的社会障碍,大力压低国家科层体制对民主自由的威胁和极权主义的诱惑力。这一切努力和企图注定都要失败,除非它们牢固植根于自由的价值中——马克思主义者把它诬蔑为“否定”自由,即社会允许个人作出决定的领域。所以如此,不仅因为自由是一种内在价值,不要求超出本身以外的辩护,还因为没有自由,社会就不能改良自己。专制制度由于缺乏这种自我调节机制,当错误造成灾难时就只能纠正错误而已。

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马克思主义已经僵化和凝固了几十年,结果失去了与精神发展和社会现实的联系。对它能够复苏而结出硕果的希望很快再一次被证明是幻想。作为阐释性的“体系”,它死亡了,它已不能提供任何“方法”用来有效地阐释现代生活、预见未来或培植乌托邦规划。当代马克思主义文献尽管浩如烟海,就其不是纯粹的历史而言,都有一种贫乏、无能的压抑气氛。

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鼓动工具却很有效,这是另一回事。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用来支持最多样化的政治利益。在欧洲共产主义国家中,马克思主义是现政权的官方正统理论,但它已完全失去信任;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已被改变得认不出来了。凡是共产主义掌权的国家,统治阶级都把马克思主义改造成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的真正根源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或帝国主义。共产主义通过利用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夺取⁵³⁰权力,花了很大力气加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或者奉行共产主义,这样,它已经造成了自己的

生活中的管理人员、职员、官员等在内的“科层”体制,这里根据上下文,用“科层”之意。——译者注

掘墓人。民族主义只是作为仇恨、嫉妒和渴望政权的意识形态才存在，它是共产主义世界名副其实的毁坏性的因素，一贯基于暴力。如果全世界都是共产主义者的天下，那么，或者世界将由一个帝国主义来统治，或者各国“马克思主义”统治者之间会有无休止的战争。

我们是重大而复杂的精神过程和道德过程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两者结合起来的结果是不能预见的。一方面，19世纪人道主义的许多乐观设想已经崩溃，许多文化领域具有一种破落的气氛。另一方面，由于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信息传播，世界各地人类的渴望正在以超过满足渴望的手段的速度而增长，这导致挫折和随之而起的侵犯的迅速增长。共产主义者在利用这种精神状况、把挑战情绪根据种种情况导向各个方面和利用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以适应其目的等方面，都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对救世主的希望是人类在自己的失败面前而无法征服自己的绝望感和无能意识的对应物。一切问题和不幸都有现成、直接的答案，只是敌人（根据选择而规定的）的恶毒妨碍了答案不能被立刻应用，这种乐观的信念是冠以马克思主义名称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常用调料——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随形势而变换内容，并且与其他意识形态传统交杂在一起。现在，马克思主义既不解释世界，也不改变世界，它只是一套为组织各种利益而服务的口号，其中的大多数利益与马克思主义最初认为与其同一的利益相距遥远。在第一国际崩溃的一个世纪之后，一个能够保卫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利益的新国际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黯淡渺茫。

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自我神化（self-deification）作出了哲学表现。这种自我神化像所有这类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企图一样已是穷途末路了：这种自我神化已经揭示了自身的束缚人类的可笑面孔了。■

【本刊声明】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并告以个人的真实信息，收到后给编者反馈者，皆可免费获得。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xx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angxc1966@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责编：方惜辰

封面设计：邹行